

中國的新生

上海明言社印行

角分
百十元
千
十萬

628.504
351.4

1



3 0590 8819 9

目

中國的新生 目錄

一、古都的燬子.....	一
二、一個偉大的英雄被困了.....	一三
三、到西安去.....	二二
四、東北的背景畫.....	三三
五、重赴西安.....	四六
六、禹廟裏的囚徒.....	五九
七、武裝的城市.....	七一
八、剿匪時代的張學良.....	八三
九、有趣的重逢.....	九三
十、西安瑣記.....	一〇三

930659

一 古 都 的 旗 子

有些城市戰勝了牠們的命運：雅典仍在四郊的醜惡中繼續活着；羅馬始終是有的羅馬；但北平不再是中國的了。

此次失陷，差不多是一個晚上的事，事前的圍城是歷史上最時間最短的圍城。一九三七年仲夏，七月二十八日，宋哲元將軍抱着空前的決心，表示抗戰到底，外國人像兔子一樣逃避到使館區。穿着灰色軍服的兵士，在街上沙袋後邊裝出憎惡的臉相或沿着厚厚的城牆勇敢地躡着大步。七月的太陽從他們無鞘的大刀上擦出火來。

這一天從早到晚，日機不斷地向城外毫無掩蔽的華軍陣地丟着炸彈，未遭抵抗，得意揚揚，第二天早晨，北平出現了一種異樣的，不熟識的平靜。穿着灰色軍服的人們離開了，只留着沙袋，沙袋上飄着一面日本旗。

原來在半夜，宋將軍含淚離平赴保定。在此後一星期中，城內中國警察自動解除了武裝，以防意外。八月八日，一羣被挑選出來的當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販，揮舞着旗子從日本使館出來，川邊將軍就當他們面前沿着東長安街檢閱他的坦克車隊和軍隊。武力佔領中國的古都，終於成爲事實了。

奇怪得很，大家對這件事並不怎樣驚訝；他們早在期待着這一着，一旦成爲事實，倒使他們放下了心。日軍佔領北平，或『北平的失陷，』不過是一個早已發作的瘡毒的外表上的徵號而已。



『北京死了，』一個美國詩人在一首輓詩裏已作如是觀，這首輓詩很可用以憑弔這最近的浩劫：

唔，當一個美麗的后盾般的城市喪失了她的名譽時，你該感到悲傷；
你說到她被強姦時，該感到痛苦，

正如詩人們說到一個活躍的城市的失陷一樣。

但北京並沒有被強姦，

她被淫污，正如魯笨的娼妓之被淫污一般，爲了營業，爲了金錢。

北京，古老的北京，她以前從未不戰而降，

在她長長的失陷史上。

北京不再是帝都了，鬼影森森的宮殿用空虛的眼睛向你凝視，

還有紫禁城內琉璃瓦鋪成的皇宮頂上的龍簷……

黃瓦的行列上的皇龍，看來是那變馴善而無惡意，

活像晒在秋天屋頂上的金色穀粒的行列中的毛蟲。

這是兩年前的事，而華北古都的輓歌已經寫就了。

一九三六年我到北平，在一所中國的大學裏工作時，我發見北平是一座蓋着白雪的美麗的城市，而同時又比柏林或但澤更富於政治的矛盾。名義上的當軸是『冀察政務委員會』，日人於一九三五年末竭力推進『華北自治運動』，而結果出現了這個機關。從秦山的娘胎裡生下了一隻小老鼠。但這依然是中國的小老鼠，牠表面上（即使不是血統上）還是屬於南京

政府，雖然政委會的委員們常常設宴招待日本軍官。

那時候北平還是中國的文化中心，而中國學生們一向是全國最活動的政治要素之一。對日人所策動的『自治』運動，只有平津學聯發出真正的反抗，牠組織了十二月九日和十六日的大規模的示威運動。這些示威運動很有力地證明華北民衆並不喜歡在日本卵翼下的『自治』。但學校當局的态度——人在這裏又感到那種流貫於一切政府機關的傳統的逆潮——却不惜用任何代價換取和平。他們向學生勸諭，威脅，或教訓他們別管『政治』，教他們獻身於新生活運動一類的可親可愛的事物。

如後來的事實所昭示，學生們是北平唯一真正瞭解時局的集團。他們在平市和四週的村莊組織示威運動，要求當局實施『非常時期教育』，『如軍事訓練，組織羣衆，準備應付他們所看見的日益迫近的戰爭，他們是唯一主張抵抗日軍侵略華北的一羣。所有殘留在垂死的古城的生命，就靠這幾千青年的力量而得以保存，而學校當局原要他們專心讀書，磨練德行，把他們祖國的生存問題放在第二位。

那時北平的空氣是不利於政治的熱情的。一般的觀念——此種觀念在外僑的圈子裏特別普遍——都以爲學生故意在學期的末尾一玩弄政治，『藉以逃避他們的學校考試（他們顯然寧願去冒明知難免的鎗彈的危險，而不願去冒尚難預卜的考試場的危險。）那莊嚴的，令人傾慕的英國大使館，堅決相信有人——大概是莫斯科——以每人兩角錢的代價收買這些孩子，叫他們去暗哨機關，逮捕，和用以對付政治犯的中国傳統的酷刑的味道。

但這外僑社會——這爲女小說家們所愛好的，被人所稱譽的北平——交際社會，『牠本身就

是一個稀有的美妙的世界，牠的不能避免的死亡，無疑的將爲所有把北平作爲自己避難所的外籍審美家們所哀悼。如果北平能繼續活下去，牠將成爲獨一無二的勝地。

這當然是一種時代的錯誤，一所殘存的勝地。像世界大戰前佛羅稜薩的外僑社會一樣。牠自己成爲一個獨立的世界，現代的中國有時向牠衝擊，但次數很小。牠的各種娛樂很優雅，稍稍有點頹廢；構成了古都的生活。在北平這個世界裏，沒有誰在發育，而設宴請客，或月夜訪天壇，算是這世界裏的正經事。（北平的魔力正如牛津的魔力一樣，足以制人死命。生活在這兩個地方的人是難得覺醒的。）

由於這一切的緣故，北平所有的聰明精巧的外僑比任何別的中國城市爲多。他們大都對於中國有一種真正的感情，不過我覺得這往往是對過去的中國的感情，他們探尋古雅的或美麗的東西：一架放在廟堂裏的無線電機，或企圖代替絕妙的漢字的拉丁化文字，都會傷害他們的感情。他們會到前門外不舒適的戲院裏去聽最成功的平劇家梅蘭芳或程豔秋的京戲。然而對於不很有禮貌的寫實的中國戲則加以攻擊。他們從唐詩優雅的詩頁上領略到過去的风味，但不能從報紙上領受目前苦痛的瑣事。滿清以後，他們一直過着這樣的生活，滿清在他們看來是一種歷史的錯誤。

他們所感到興趣的，是定型化了的中國，不是變動中的中國。

北平——這過去了的帝都，牠的一切都適宜於他們的生活。北平比現代中國任何其他動亂的大城市都給他們更少的感觸。牠有堅厚的城牆護衛他們，有一年一度的博覽會迷醉他們，有高出洋杉叢蔭的金色屋頂的行列和西山美麗的山脈供應他們欣賞。北平是中國的靈魂的

最後安息地……直到日本兵來揭破那些空虛的祕密。

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另一個北平許會出現，會使日人的旅行業更加繁榮；在相當的時候，前清的天子許會重登龍位；但大概不會有許多外國人在那裏欣賞這種景象了，北平的生活永不會再像過去那樣的生活了，這對於女小說家們該是一種絕大的悲哀！

到末尾，甚至北平「交際社會」也被關於日益迫近的浩劫的流言所震撼了。當日軍在城下進行小規模的戰爭的時候，當天皇的神聖的坦克車在大街上不顧一切地往前直衝的時候，要保持部隊正常的紀律，是很困難的事。中國的商人們站在各自的店門口，在不可思議的靜默中注望「皇軍」的行進。沒有一點反抗的聲音。

在整個的北平，只有學生們發出呼聲。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後籠罩着華北的武裝和平的氛圍中，只有他們敢於組織自己的隊伍，敢在日軍的坦克車任意橫衝直撞的街道上喊出民族抗戰的呼聲。當大旗在牌樓下面被舉起來的時候，當成千的學生在藍壕和紫禁城上的大城樓旁邊行進的時候，衝散他們的行列，迫使他們回頭的，是中國警察的毛瑟鎗和大刀。

這故事始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北平的學生示威運動。這是這一類運動的最後一次。

當黎明在陝西出現的時候，當蔣委員長正在臨潼後邊的積雪的小山上蒙難的時候，一種類似的祕密活動在北平各中學和大學裏進行着。一羣一羣的學生穿過後門，或爬過宿舍的牆壁，出到陰暗的胡同裏。他們穿着棉袍，圍着羊毛圍巾；許多女學生穿着藍色絨線衫和法蘭絨襯衣。這前衛的隊伍帶着捲起的旗子和一捆一捆鉛印的傳單。他們準備來一次愛國遊行，

而警憲們也許得到了風聲。

這一天的清早，匆匆吃了早餐，我和一羣新聞記者一同出發，探訪遊行示威的隊伍。我們的車子駛向西城，大多數中學和大學都在那里。

街上已充滿了小販，水夫，和顯然沒有什麼目的的路人的習見的羣集。街上的叫喊聲和木頭車軸的呻吟聲，織成北平早晨的交響曲。但我們的車子駛過各中學的大門口時，只見帶着來福鎗的警士把守着大門，攔阻校內興奮的學生們。這時還沒有憲兵出現——這種穿着黑色皮短衣，騎着機器腳踏車的特別警察，老是在這樣的場合出現的。他們是突擊隊，受過特殊訓練，專做這種工作，與在中國一切公共機關的大門前閃爍的和黨可親的警察大不相同。

『這該是一場好戲，』我的朋友頓君說。他是美籍青年記者，他在前一年的十二月看見過遊行示威運動。警察簡直沒有出動，大多數中學生却已經出動了。『他狠狠抽着烟斗，撫摸他那未經修刮的下頷，清晨的空氣是怪新鮮的，有霜的聲音。』

過了那條貫通南北，穿過西城的大街，我們迎面碰到第一羣學生。他們故意沿着一條小路急走，不斷地有三三兩兩的學生出入，他們彷彿從每個角落裏出現的。腳踏車隊在不整齊的隊伍前面當心地偵察着。如果這時有警察出現，隊伍很容易分散開來，過後再行集合。

我們攔住一個外貌誠懇的少年，他頭戴學生帽，身穿中學校的制服，挾着一捆輕鬆的傳單。

『你們在什麼地方開會？』頓溫和地問。

孩子懷疑似的皺一皺眉頭，走開了。但一個女學生急跑上來作一番誠懇的解釋，她那被

風吹亂了的短髮披蓋着她的眼睛。

「這幾位是外國新聞記者——他們是我們的朋友。」她把幾張宣言和着色的諷刺畫塞進我們車子的後座。「我們一到西四牌樓，就在那裏開會。北大學生從東面來跟我們會合。十點鐘在景山後邊開大會！」

她揮一揮手，離開我們，學生們發現了聽衆，就喊起口號來：『中國不亡！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都很年青，都很愉快。當一羣一羣的學生在大街上會合的時候，苦難就要到來。

在西四牌樓，四座着色的牌樓聳立在十字路口的上邊，有普通的警察駐守。但憲兵還沒有出現。

我們等待着，直到主力隊伍——此刻有三四千人之多——的前部開始穿過街道，向東移動，旗子舉起來了開始唱歌了。一羣人聚集在十字路口，好像被或種魔力吸引住似的。苦力們放下他們的重擔，從眼睛拭去汗水，伸直脊背，注望着隊伍。從市場來的小學徒們，在旗子旁邊跑邊喊。

這行進的行列有一種奇特的刺激人的東西——這是一種在丁普哈夫（柏林的工人區。）和在紅場上可以體驗到的東西。但我覺得中國學生的行列，比希特勒的柏林勞働節的一切大言壯語或莫斯科的青年節的場面，都更使我感動。這種拚命的姿勢，這種處在極端劣勢下的敢死隊。這一天，正如過去其他日子一樣，唯一的問題就是：在他們未被衝散以前，在大刀和機關槍尚未活動以前，他們到底能走多遠。我們除了欽羨這些不怕來福鎗的掃射而自願衝

破警衛線的孩子們的膽量外，還有什麼呢？他們中有許多都是十四歲到十八歲的中學生呀！

十二月十二日恰巧是段祺瑞的出殯日子，這個著名的安福系——華北最腐敗的政府——的領袖享盡了福壽，此刻正被抬出他的舊都。段將軍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令向北平學生開鎗的腳色，他把學生騙誘到他的官舍外邊狹窄的胡同裏而加以陷害。當羣衆慌忙逃避段氏衛隊之鎗火時，差不多有一百個屍體堆在胡同裏，他們的鮮血濕透了塵土。那一天是段祺瑞的政治生涯的末日，但這並沒有影響其出殯規模之宏大。彷彿這從城外一個廟裏湧向西山的殯儀，把北平大多數警察都吸引了去。我們所伴隨的遊行行列此刻至少有五千人，順利地行進。前面是景山後邊的城門，北大的隊伍該在那裏等待我們。

一小隊憲兵終於出現了，跟着移動的隊伍走。他們顯然等待着襲擊的機會。隊伍突然到了一個女學校門外，許多學生離開行列，奔到廟門口喊裏邊的女學生出來參加。隊伍出現了一個罅隙，警察們就揮着大刀和手鎗衝入隊伍裏。

一時秩序大亂。許多裹在長袍裏的女郎爲着躲避這突然的襲擊慌忙急走，終於跌倒了。那些停步扶她們起來的學生，遭受刀扁的敲擊，或笨重的軍靴的蹴踢。這時還沒有開鎗，但逮捕好些學生領袖，便衣偵探早對警察們指出了這些領袖。這次突擊很得其時，隊伍暫時被衝散了。

但這不過是一個頓挫：當時沒有足夠的警察可以給學生真正嚴重的打擊。領袖們重新調整行列，因爲在只有四分之一哩遠的前面，又出現了另一支隊伍。我們能夠看見他們的旗子，聽見他們的喊聲。

『你以為他們能够會合嗎？』我問頓。我們此刻是站在車外了，忙於攝影。他用一個拇指向前面的城樓一指：『看那邊呀！』

三十名左右的憲兵站在城門的前面，守住隔在兩支隊伍間的道路。他們有來福鎗和機關鎗，顯然很緊張。這種光景看來更加危險了。

我們連忙跑到隊伍的前頭，隊伍業已停下一個軍事會議。兩支隊伍相距不過幾百碼路——如果聯合起來，就有十萬人之多。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竟有這麼多學生出到街上，要控制這樣龐大的羣集，警憲的數量實在太少了。

但警憲們有鎗，看樣子，他們有開鎗的可能；日子還很有希望，犯不着遭受過大的犧牲。隊伍決定後退了。

命令傳遍了行列。有抗命的嗷嗷聲——在這種處境中向後轉，適足以招致對方的襲擊。但紀律仍然很好。大旗向後轉了，笨重的隊伍開始移動。『他們有機可乘了！』有誰在我們後邊抱怨道。

果然，結結實實的一隊穿皮短衣的傢伙疾奔而來。他們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從後面襲擊行動遲慢的羣衆，衝散他們。隊伍後部的學生擔心地回顧着，但他們並沒有離開遠伍。警憲們加快腳步前來進攻，很像大屠殺的光景。

但正當肥胖的警長一邊扳足毛瑟鎗的扳機，一邊發命令的時候，一種奇怪的混雜出現了。在警憲的後面有一個騎腳踏車的學生，他沉着地幾乎是莊嚴地前進着。他愉快地微笑着，騎過警憲們的旁邊時同他們喊道：『同胞們，你們爲什麼要攻擊我們？我們不是反對你們！』

我們僅僅反對日本倭子。我們愛我們的祖國，正像你們一樣。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這番話說得這樣得法，像符咒一樣發生效驗。憲兵們停止追擊了；兇狠的表情立刻從他們呆笨的大臉上消失了。學生們就抓住這個機會，一齊喊道：「我們愛國的警察萬歲，」之後，當然沒有什麼事情了。

中國是富於這一類悲喜劇的。一個演說者竟有這樣的力量，在別國實屬罕見。這是因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易動情的種族之一，得時的小訴總能打動聽眾，可以說萬無一失。漠視人命（這種東方人特有的漠視，恐怕在日本人中更加普遍）的他們，有時也會湧起非常爽快的博愛。

但與這種出於感情的博愛相對立的，是一種特別無情的殘酷。就在當天，這些同樣的憲兵，一句話語便能停止他們的行動的憲兵，又向剛才讚頌過他們的學生們進行殘暴的襲擊。他們把學生的行列從大街上逼到狹窄的胡同裏，騎着機器腳踏車從後邊衝擊他們。一個一個被捕的學生被領出胡同，被毆打得失了知覺。日本的軍官們一直從使館的汽車裏看着這一切活劇。

我們當時還料不到這是北平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學生示威運動。事實上，這簡直是華北政治活動的最後一次的公開表演。尚未成丁的少年居然在垂死的古都的街道上喊着民族抗戰的口號；如果這種景象有些悲慘的話，那末同時也可從此看出一點預兆來。

中國的未來——這在目前似乎不全是一種老生常談——是屬於中國的青年人的，因為除了青年，中國的一切都在連根地死滅着。

近年來中國學生運動所完成的業績，是一種歷史的事實。中國至今還殘留着一種對於讀書人的傳統的敬重，中國的學生經過許多的變遷，還保持着某種爭取政治自由的權力。他們就盡量利用此種權力。世界大戰以後，通過某些最難忍受的屈辱的時日，中國的學生們一直維護着民族獨立的精神，如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五年的十二月運動。在連處僞的言論集會自由都沒有的國度裏，學生示威運動是唯一反對官方意見的公開的表示。那時中國的學生羣實際上是一個反政府的政黨，牠有獨立的民衆的後盾。他們的示威運動應該被人重視，因為這是國內輿論的唯一表現。

北平十二月十二日的示威運動是成功的，雖然沒有百分之百地實現預定的計劃。這是羣衆對於日軍侵略綏遠的抗議，對於日本水兵武裝侵略青島的抗議，對於逮捕上海七位救國領袖的抗議。牠要求政府採取更強硬的手段對付外來的侵略，要求政府對內至少給與一些政治的自由。

北平的日軍當局非常重視這種示威運動，他們乘車跟着隊伍走。最後他們向處境最感困難的宋哲元發出警告：除非宋氏派兵「維持和平」，日軍將有所行動。到了下午，隊伍分散了，而最大的殘部——約有五六千學生——被禁於景山，有幾個兵士在外邊把守。

這是在北平才能出現的非常奇異的景象。在軍警嚴密把守下的堅厚的城門裏，在景山的山脚，被禁的學生們開了一個大會。在城門的正對面，在紫禁城內蓋着金色琉璃瓦的宮殿裏，驚惶失措的官員們舉行了低聲的會議。街上佈着警戒線，但在警戒線的邊沿，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羣集。

他們告訴學生：宋將軍要對他們講話。學生們當時覺得滿意。但過了幾個鐘頭，他們又得到通知，說宋將軍在西山參加段祺瑞的葬禮。天色漸漸暗起來了。景山頂上的五個亭子對着春天的落日顯出牠們的側影。

我跟一個的同伴等在城門的外邊；任何人都不准進出。『我不贊成這樣，』我的朋友最後說道。『他們這樣等到天黑，讓憲兵們來擺佈他們。』這種事以前曾經發生過了。

但突然間，宮殿門口的官員們起了一陣騷動。北平市長到了。穿着緞袍的形體文雅地搖擺着。一個矮小的日本人，身穿襯着絨領子的黑大衣，正在咕咕格格地說話。有什麼消息呢？

『市長要對學生說話，』一個頭戴羊皮帽的肥胖的偵探宣布道。我疑惑地向那位朋友望了一眼。『難道這種事也時常發生的嗎？』

『我不懂，』他回答。『看他進城去了！』在嚴密的警衛中，市長掃進了城門，城門立刻又關上了。

市長說了很久。他所說的話，像我們後來所知道的一樣，並不怎樣中肯，但他的態度却非常懇切。贊成或反對的叫喊通過厚厚的城門傳到外邊，變成一種悶澀的聲音。城外的羣衆（這時警戒線撤去了。）帶着極度的關心傾聽着這種喊聲。

最後湧起一陣歡呼聲。城門開了，秦市長像進城時一樣匆急地走了出來。『學生又要列隊遊行了，』我們聽見這樣的消息。『他教他們列隊回到各自的學校，大膽地揮着旗子唱着歌曲，』官府軟化了。但爲什麼呢？誰也猜不透。

學生的隊伍與高柔烈地流過了黃昏的街道。軍警不見了。從東到西，隊伍在宮殿的御溝旁邊，在突然擠滿了觀衆的街道上行進。高呼的口號在城牆下邊獲得回響。白色的大旗在街燈的映照下閃着光輝。

熟識的救亡歌曲在夜空中清晰地響着：有幾隻歌，路人們也跟着唱。但當最後一隊學生湧出這空虛的花園，把牠讓給了陰影，讓給了中國末代帝皇的冤魂的時候，我聽見一隻新歌。牠有一種強有力的滾動的旋律很像『馬賽曲』。

『他們在唱什麼歌？』

我的朋友轉臉對着我，他的雙睛在厚厚的眼鏡後邊閃着光。

『這是紅軍進行曲，以前從沒有在北平街道上唱過這隻歌。』

幾個鐘頭以後，一個學生跑到我的跟前，帶來一張匆促印成的廣擴電文。他兩手顫抖着。

『你聽到這消息嗎？今天早晨蔣介石在西安被東北軍殺死了。』
我們是瞭解這事情的。

二 一個偉大的英雄被困了

沒有誰知道。在中國，關於蔣介石將軍的被困的謠傳，是常常發生的。近年來這種謠傳比較少些了，但這一次却不僅僅是一種謠傳。

在西安，在這中國最古王朝的首都，十二月十二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發生了一次叛變，而張學良和楊虎城、陝西綏靖主任）就是這叛變的首腦。一切似乎都很清楚。他們共同扣留了委員長。他們致電南京中央政府，報告這件事情，而且提出某些關於改變國策的要求。這些要求的内容人言各異，而關於這些要求的解釋也互不相同，正如莫斯科和東京之不同一樣。在最初幾天內，有一個疑問不斷襲來：蔣介石將軍被殺了嗎？

人們知道張學良將軍曾以私人名義致電蔣夫人，保證她丈夫的安全。凡是瞭解張學良的人都相信這個保證是靠得住的。那些只知道張氏過去「變節的」歷史的人，却因此更加懷疑，相信這是詭計。但一切瞭解張氏的部隊——來自滿洲的唐東北軍——的人，都說不管張學良的意下如何，他的部隊一定會把事情解決了的。蔣氏的生命不值一個銅枚。

最初的消息引起全中國的驚惶。如果向來不大有人信任南京政府的話，則這一次的確提高了蔣介石將軍的聲譽。近幾個月來，甚至那些對委員長個人沒有好感的人，也認為他是團結中國的「強有力的人物」，「只有他才有可能做全國的領袖。特別有兩件事情加強了這種信念。第一件是同年夏天兩廣事變之和平解決；第二件就是人們那種共同的信念，相信（在日軍對綏遠的侵略顯然強化了中國外交政策以後）南京政府終於開始採取一種主動抗日的政策了。

這中間發生了兩件事情，一件是一個最愉快的吉兆，另一件則比較麻煩了。

十月三十日是委員長的五旬壽辰，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用獻機的方式慶祝他的壽辰，利用這個機會以增強中國的空軍。各省政府和各地總商會爭先恐後地向這民族抗戰的領袖

飛機紀念，有許多都是全國小學生和窮人捐出來的。我們過後還要說到這些飛機。

十一月的初旬，上海各紗廠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最初是總罷工，一星期後，就集中在日本老闆的紗廠裏，顯然有政治的動機。這浪潮像野火一樣蔓延到天津、青島和濟南。這是多年來第一次嚴重的工潮。

在十月間，我曾冒險由剛剛完成的粵漢鐵路南下。我在廣東目睹紀念的典禮。兩廣事變已經解決了。我到廣東時，廣東的軍事獨裁者陳濟棠已經離開廣東，到歐洲遊歷去了。說得更漂亮些，如一般中國人所說，就是『出洋留學』去了。

廣西的統治者白崇禧是與陳濟棠不同的人物，革命軍北伐時，他是蔣介石的參謀長，一般人都認為他是僅次於蔣氏的全國最能幹的軍政領袖之一。陳濟棠失敗後，白氏退入自己廣西的堡壘裏，他在過去幾年中統治廣西，有了顯著的成績。兩廣事變解決後，白氏接受了南京政府中的新職位，但他表示不想立刻離開他自己的根據地，因為紫金山的空氣還不够清新。他不想步馮玉祥的後塵，做有職無權的空頭官。

陳濟棠與本書無關，有的也不過是間接的關係。我們可以說：廣東民衆用以歡迎京粵聯合和蔣介石蒞粵的熱情的一大部份，還是他們對於陳濟棠離粵的歡欣的殘餘，這並不是過份的滑稽話。除了近來一個英國首相外。我簡直不知道還有誰像他這樣為一般民衆所厭惡。但白崇禧却依舊是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個重要的角色，他過後還要在這故事裏出現的。

關於華南民衆對蔣委員長的好惡如何這個更重要的問題，却不易說明。蔣介石將軍自己就是南方人，他就在廣州附近黃埔軍官學校裏開始露頭角的。一九二六年他做了北伐軍的總

司令，離開了廣東，而在比較重要的十年中，他沒有回去過一次。他此次奉凱回到這個最典型的中國大城而，袁明寧身最後一次的回歸，這是多年來全國統一運動最重要的進步。

在壽的壽辰，廣州固有的喧鬧中又加上樂隊和爆竹的繁響，形成了狂歡的氛圍。那天晚上我坐在一間小電影院裏，牠放映蔣介石將軍檢閱祝壽的飛機隊的特殊影片，接着又放映莫斯科紅場閱兵的新聞片。當委員長形像出現在銀幕上的時候，觀眾一齊站起身來，合唱國民黨的黨歌。而斯大林和紅軍的出現又引起他們的歡呼。

廣東一向把蔣介石將軍看作革命的領袖，而蔣氏自己也很當心，竭力不使他的擁護者感到幻滅。他未曾直接參加對華南革命運動的殘酷的鎮壓，原因很簡單：他的號令不行於華南。現在南京政府爲要更進一步支助廣東，定出了一個建設和開發實業的精密的計劃，由英國大量投資，英國在華南的利益每月都在增加着。但如果南京政府要繼續保持西南的歸順，則牠必須採行一種爲這國民革命的發源地所能接受的政策。

在上海，罷工發生的時候，正是由救國會（各黨各派的統一組織）領導的愛國運動鼎盛的時候。保衛綏遠的募捐運動正在進行着，商人們和銀行家們都公然支助救國會。反日情緒空前高漲，表現出空前的胆量。

我腦子裏還存在着生動的記憶：當救國會七領袖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被捕，經過租界法庭一些非常可疑的審判手續後，即移交給中國當局的時候，上海各界是感受到如何狂烈的打擊！逮捕他們的理由是由他們從事叛國反政府的活動；而日本人控告救國會的罪狀是由他們暗中煽動紗廠的罷工。此後不久，大批自由主義的和進步的刊物（在中國公開出版的，當以自

由主義的和進步的刊物爲最多）以及許多直言不諱的書籍都爲當局所查禁。這回到了舊日最反動的時期。

中國政府不顧自己的體面，漠視工人的要求，很快地解決了罷工的風潮。日本陸戰隊在青島登陸，日本水兵在上海街道上巡行，監視着工潮的解決。

但這一切仍不足以損害南京政府和蔣委員長聲望。這主要地歸功於新聞界的非常巧妙的關於日軍侵綏的宣傳運動。到十一月下半月，南京政府充滿了『強化外交政策』的熱忱，這在『拒絕日本某些要求，派兵增援華北前線等事實中表現出來。』我們不單要保衛綏遠，『一個南京政府的官員於盛宴之後興奮地告訴我說。』我們要向察哈爾進兵。多倫是我們的第二目標。於是再收復所有失地。這是一個美麗的夢，這夢太甜蜜了，一時不易實現。但牠的宣傳作用是很大的。

爲要瞭解中國對西安傳來的消息何以要給與那樣的反響，說一說上述那些事實的背景，是必要的。救國會諸領袖都是著名的專家和有相當聲望的學者，他們之被捕會引起非常普遍的抗議。日本水兵在青島登陸這一事件，很有發展成極端嚴重的民族危機的可能，但這種危機終於在顧全政府體面而犧牲工人利益的條件下順利地避免了。綏戰正酣，忽而聽說有生力軍派往前線，忽而聽說祝壽的飛機隊即將北飛迎擊日本的轟炸機，報紙上充滿了『英勇的綏軍』的司令傳作義將軍的相片，綏軍的英勇是最值得欽羨的，因爲既無援軍又無飛機到達前線。

所以，大多數人都覺得蔣介石在陝西殉難或被拘禁，都是對中國的一個致命的打擊，此

種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當全國統一局面顯現在眼前的時候，正當南京政府真正下了決心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的時候，國家強有力的頭腦卻被西北叛徒割掉了。

叛徒是用其表現此種「勇氣」的「勇氣」字眼。對於張學良及其同夥們，無論怎樣責罵都不會過份。委員長說：「胡漢民是叛徒，即此足以見之。」他雖然如此勇敢地冒險踏入西北這危險的疆域，他的膽量值得人們特殊的贊揚，他為什麼要對張學良，誰都不大明白；但他此次行動的勇氣敢到張學良的程度，這是大家所同意的。

現在，大家只認爲「魯莽」真個將介石將軍了，連他最忠誠的傾慕者也這樣說他。蔣氏所以能獲得成功，所以能至國內外交圍而京政府的信譽，全由於他政略的精明，張學良剛剛相反，是以無決斷，無思慮出名的，由於一時的衝動而胡幹一趨，這在他是完全可能的。

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的性質之與蔣氏差異，正是這又人們的疑問的原因：張學良所扮演的角色，是忠誠的與蔣氏的。但由於其略高明而從宋美齡的蔣氏，爲什麼貿然踏進一個魔窟去呢？蔣氏大膽，張學良是特麼亮的，而現在却鬧出大亂子來了。但那些瞭解蔣氏的人都說這是由於蔣氏所致。蔣氏曾以恩威並施的手段粉碎了所有的敵手，建立了中央政府，說他做這事不後悔，是絕無其真。

「雙十節」前夜的北京的異相，裏在一種神秘的濃霧中。許多事情關係不起來；許多動機弄不清楚。

在北京，生活大抵跟平常一樣。街上沒有集會，沒有示威運動。在緊閉着的房門裏面，

熱情的老主人，而且其談話，對於我這位僑民，談話中少許地獲得了大大的面子。但大多數人民是否贊成他的舉動，却是一個絕大的疑問，到處都是謠言，在酒店裏，在飯館裏。在北平，最迫切的問題當然是：日本人對這將有什麼表示呢？

但日本人也跟其他人一樣，搖惑萬狀。日本官方宣布這是共產黨的陰謀，他們就以西安事變來辯護最近締結的德日反共協定之必要。他們比莫斯科更敏捷地亂發消息，而他們在中國的宣傳確比蘇聯更有效果。不過當時他們並沒有乘機採取斷然行動。

英國使館寬宏大量地忍受着當前的苦惱。這事變剛剛發生於英皇讓位之後，嚴重的打擊連接地出現。聽說英使館一個高級官員說過如下的話：『英國的皇權正在動搖着，蔣委員長被扣留了；而更糟糕的君權則信仰了。』但像後來事實所證明的一樣，大英使館却好好地渡過了這個難關。

我當時很有興趣地搜集着關於當地對西安事變的反響的材料。我有一個朋友，住在一個朋友家庭裏，他告訴我：他的女東家在星期日早晨拿起報紙，讀到那致命的標題：激動地吐出了她的早餐。這的確表現出強烈的情緒；但我覺得牠可以有幾種不同的解釋。

國家的文化人，赫赫有名的學者和一思想家，『到了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就被人看作引路的指針。這種情形比任何其他國家爲甚，』而他們此次的作爲却有傷自己的尊嚴。他們中有一個共知名的人物，他多年來一直是和平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熱烈的擁護者，而此次却大發雷霆，比任何人都更氣憤，要求下令討伐，把西安這個叛城夷爲灰燼。許多偏袒中日親善和中日合作政策的腳色，也堅決要求討伐西安的叛軍。他們中彷彿沒有一個人耐心探究事變

的內容。

相反的，軍事領袖們的頭腦却很清醒，這也許因為他們消息比較靈通的緣故。而學生們這些易於發火而以『搗亂』出名的份子，却一致保留着自己的判斷。

民衆，中國四萬萬人的廣大的集體，名義上常被祝福而實際上常被漠視的一羣，一致保持沉默。不過他們一向都是沉默的，不僅是南京政府成立以後才沉默的。爲歷代士大夫所珍愛的精雅的方塊字，使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成爲文盲，而在這樣的國家裏，人民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也默不作聲，這毫不足奇，中國民衆每隔很長的期間才用一種由盲目的本能的憤怒所引起的暴動，來表示自己的意見，如在太平天國時期，在義和團變亂時期，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期。大部份時光他們都是有口無言的。

一切謠言和消息報告，顯然都不能使人滿意。對西安所發生的事情，我們都不清楚，但牠聽來又很使人興奮。我有幾個朋友在西安，其中有一個還是張學良自己報紙的編輯。如果我能夠到西安去，他許可能解決一些疑團。

但怎樣去呢？平時都是由隴海鐵路去的，隴海路在鄭州切過平漢鐵路，再沿黃河通過潼關的關口。但潼關目前已成爲內戰的前線；鐵路交通以及一切別的交通都已斷絕，而『叛省』的邊界當爲政府軍所封鎖。

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坐飛機去。我打電話問那個新聞記者，在遊行示威那一天同我們一道的那個新聞記者。

「搭飛機到西安去怎樣去法？」

「請你告訴我吧！」他回答。「目前在中國的一切新聞記者都急想到西安去。但我已同歐亞航空公司交涉過，說我要單獨包一架飛機——他們聽也不願意聽。他們恐怕失掉飛機。你要搭飛機到西安去，無論出多少錢都辦不到。」

這看來是無望了。事變發生後已過了三天，但情形仍然那樣混亂。大家都相信蔣還活着，但什九已成爲囚徒了。我很想到西安去。

第二天傍晚，一個中國朋友打電話給我：「你看到塔斯社關於西安事變的電訊嗎？」我沒有看到。但那些電訊是很刺激人的。根據真理報和消息報編輯部的意見，西安事變是由日本人策動的。蘇聯報紙說了許多不滿張學良的話。

這消息是很離奇的。除了一切不滿張學良的謠傳外，張氏給與人們的印象，始終是一個堅決的反日者。「巧妙的宣傳運動，」我說。「但莫斯科似乎說得過份一點的這消息靠得住嗎？」

我的朋友是東北人，聽到我的問話，他開始吐着口水，這在東北人是一種不平常的舉動。「不，當然靠不住的。他們怎能從西安得到真實的消息？但你知道這種論調將在中國引起怎樣的結果。一切自由主義者和開明份子——騎在牆上考慮着統一戰線的一羣，立刻就要向右轉。如果蘇聯不支持這種政策，誰來支持呢？」

我非常憤慨。停了一會，他接着說：「你願意到西安去嗎？」

願意到西安去？這正是我幾天來所渴望的事情。「怎樣去法呢？」

「我有一個朋友是東北人，他認識張學良，他今天晚上動身到太原去。你認識那個新聞

記者嗎？」他說出我的朋友的名字。「他也去。他們的計劃是由山西到西安。」
 如果顧也去，那是很好的事情。我知道自己很可以替某些英文報寫篇關於西安事變的通訊，除非已有通訊員駐在西安。

「我就來，」我說。「到什麼地方跟你朋友會面呢？」
 他告訴我一個會面的地點。火車在一小時內就要開了。

三 到西安去

他好像剛從牢獄裏出來的樣子。但在中國，這並不是怎樣稀奇的事。

一個瘦弱的、有點捲縮的軀體，裹在一件黑色大衣裏，大衣的皮領子圍繞着他的兩耳。他老是戴着帽子，就是在旅館的遊息裏場也不脫下。嘴巴週圍有勞苦的皺紋，兩眼無止息地巡視着，死盯住不熟悉的物象。

他不停地抽烟，兩隻纖手做出神經質的動作。他臉孔消瘦，富有機智的表情。他有迷人的微笑。他裹着刺豎瑣爾色的鞋罩，這跟身上其餘服飾頗不調和。

他被介紹給我的時候，說是姓趙，此外關於他的事情，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天晚上，空氣顯然很緊張，但他表示毫不關心個人的危險的樣子。我們後來知道這就是他的最大特性。

我把幾件衣服——大都是羊毛衫和厚襯衫——裝進背囊裏面，把一雙靴子和馬褲捲在綢裏子的被包裏。（這種被包是用品以防止傳播熱病的虱子的侵入，中國的北部，到了冬季，虱

子是最多不過的。)原以為這些都是旅行的必需品，但到後來却悔不該帶這麼多行李。

我們到西站時離開車還有十分鐘。別人都沒有買票的，但我還得去買票。售票處的窗口關上了門。

「買票！」我竭力提高聲音喊道。腳夫蠢笨地站着，伴着放在手推車上的我的行李。一個警察冷靜地聳聳肩膀：他說火車滿了。我敲着二等車售票處的窗門。預報開車的鈴聲已在響了的

窗門不願意似的開了，一個繃倦的職員毫無興味地注視着我。「沒有位子了：搭客太多了。」他溫和地說。他啜了一口茶。

這無法可想了。「頭等車可以想法嗎？」我切熱地問。他帶着認真的熟慮的神情翻着簿子。是的，還有一個舖位空着。他用勁地，嚴肅地填滿這個空號。我簡直不敢揆延時光等他給我找頭。

我們終於找到了我的車室，同室的是一個肥胖的中國商人。他已在下一格的寢台上睡着粗重的駝鞍，上身赤裸，活像一個睡着的彌陀佛。車內的熱度令人難堪。

在月台上碰到頓跟他的朋友們。趙已不見了。引擎煩悶地吼叫着。

「再會，一切……」

「再會——我們等着你們的報告！一路順風！」

我們覺得自己應該滿足他們的希望。

列車沿着北平城腳緩緩地爬出來，在城基上的積雪映襯之下，顯得漆黑。我在列車內往

前走着，發見趙獨自站在一輛二等車的月台上，注望着城內的燈火一一消逝了。他樣子很沉鬱。

『我的妻子還在那裏，』他突然說。他的聲調告訴我：他這次旅行並不愉快，雖然他的態度仍很溫和，但我第一次聽見他聲音發抖了。

『你打算什麼時候再跟她見面？』

他聳一聳瘦削的兩肩，悽慘地微笑着。『誰知道呢？我已跟她訣別了！』

頓沿着走廊走來，後邊跟着一個魁梧的愉快的人。『哈囉，你在這裏！誰要喝酒？這一位是神父……台甫叫什麼？』

牧師對我們兩人微笑着。『科克倫——科克倫神父。我會見你，你覺得愉快。』他頭髮灰白，有孩子氣，十分和善。在購車裏，我們這幾個各不相同的人湊成了一個集團。

這位神父屬於美國監督教會，此番正回到華中去。他已經穿過西伯利亞，滿腦子都是關於蘇聯的智識，只想講給別人聽。他對着一杯啤酒，很神氣地展伸着身子。

『那些俄國人已經獲得了正確的觀念，』他挑戰一般地說，好像預料有人反駁似的。『我告訴你們，我們從蘇聯可以學得許多東西。』

我看一看頓的眼睛：這是一種新奇的經驗。我們倫敦每日報知的特約通訊員，這材料對我應該是很寶貴的。但在去西安的途中，我跟泰晤士報（我會替該報做過專管某次審判案的特約訪員）的比較疏淺的關係，也許是更有用的盾牌。我的最安全的旗號是大英帝國的旗號。頓是美國人，而且是一個真正新聞記者，所以他什麼材料都需要。我們很客氣地對神父的

話表示懷疑。

但這位神父却有強烈的改宗的意欲。他的熱情像浪濤一樣泛湧着。我不時看着趙的眼睛——他帶着敬畏的神情看待這位奇怪的教士。我們介紹趙時，說他是一個教會學校的畢業生。一切看來都是那麼不真實，我覺得我們彷彿是參加假面跳舞會的跳舞者。

『你們大概以為俄國人不會花許多時光招待一個傳教師，』和善的牧師說。『但我從沒有碰到過比他們更友愛的人。他們領我到他們反宗教的博物館去參觀，他們以為我會受到激動。』他咯咯地笑起來，哲斯脫敦式的笑。（哲斯脫敦英國現代散文家）『結果受激動的倒是他們自己，因為我告他們：博物館所有的東西，美國科學展覽會裏都有。他們一定以為資本家們正在軟化着。』

我們帶着惜別的情懷跟科克倫神父分了手。像我後來知道的一樣，這樣的傳教師在中國真是鳳毛麟角。他的聲音在我們後邊的走廊裏響着：『……記着，……孩子們，正因為我沒有發昏，我不必閉上我自己的眼睛。心地要坦白，我說，心地要坦白！』

在頭等車室的悶熱的空氣中，睡覺是不可能的。四點鐘左右，我從車室走到廊道裏呼吸空氣。不消一個鐘頭，我們就要到石家莊了，再從那裏轉車到太原。列車往前滾着，帶着平漢路特有的震動，這條鐵路在內戰期中曾無數次成爲火線，無數次被炸壞，路基和車輛一直沒有完全修理好。

茶房在走廊盡頭的盤曲的牀位上睡着。但突然間，好像聽到一個信號似的，他抬頭一望，說一聲『薄沱。』我們正在穿過薄沱河。

橋的鐵欄下邊，是河水的黯淡的閃光。帶着病容的月亮，模糊地在河裏跳舞跳過河去。到了石家莊，我立刻離開車室，對於頭等車的小販，殊覺憤慨，在這個奇異的國度裏總有這一套。我在列車的另一端看到頤和道。趙正在跟一班穿皮大衣的中國人熱烈地握手，這班人樣子很神氣，顯然很高興看見他。後邊跟一些護兵，他們抓起我們的行李，沿着鐵路飛跑，不經過車站的進出口。一個火車頭噴出一陣蒸氣，我們就隱沒在這蒸氣裏了。

兩個外國人對這秘密（指行李不受檢查的祕密）感到一些昂奮。別的人却並不怎樣大驚小怪。中國的政治總有點黑幕的。這些是振學良的朋友，石家莊與保定間這段路線是由東北軍萬福麟部駐防的，萬氏是以前滿洲的名將，聽說他到處憑藉武力，為所欲為。這班東北人對於報紙的力量有一種熱狂的信仰，他們已不得幫助外國新聞記者到西安去，使西安事變中他們方面的立場可以大白於天下。因此他們就無視國家檢查的權力，獨斷獨行。

我們跟着我們的嚮導，穿過鐵路線，踏進一間燈光陰暗的旅館。我們一直被領到樓上一個房間裏，雖很像革命前的俄國旅館的房間。門上釘着小銅牌，寫着「超等房間」等字樣。只有牀是中國式的，在大城市的妓院裏可以找到這一類牀，兩頭都有鏡子的。窗簾拉得緊緊的。

茶拿來了，我們圍着一張大理石檯面的桌子坐下，討論計劃。這信人進進出出。我們拿出地圖，研究着。趙此刻變了另一個人了，他兩眼閃耀着熱情的光輝，我在北平第一次在他臉上看見的那種猙獰的神色，此刻沒有了。我們是置身在朋友的隊伍裏了。

我們共同決定的計劃，簡單得很。我們要搭第一班車到太原，在太原過夜。第二天搭開

往潼關的火車，在一個名叫「侯馬」的小站下車，向黃河進發，黃河是山西與陝西的界線，要設法渡過牠。趙說，可以先遣一通信到西安，渡河以後，就會有車子來迎接我們。從那兒到西安不過兩天路程。至多在五天內可以結束全部旅程：要是運道好的話，還無須五天。

就是在路上耽擱這些日子，也是很要命的，但據我們所知，這是唯一安全的路線。從南面出發的路線被南京軍隊封鎖了——隨時有爆發大戰的可能。我們所選定的路線應該是不會被封鎖的。

在我們全部計劃中，我們不得不考慮到一些捉摸不定的人物。山西在「模範長官」閻錫山將軍的統治下事實上是一個獨立的省份。閻將軍在政治上是一個純粹的個人主義者：他精明幹練，有口皆碑。西安事變爆發以來，閻錫山一直在扮演著調解人的角色——而且大概演得很不錯。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也許變成了一個純粹的機會主義者，大體上偏向於南京政府，因為南京政府到底是較強的一面。

第二個人物是馮欽哉將軍，他在陝西境內的防地，就是我們渡過黃河後必經的地方。馮將軍是楊虎城的人，由於楊氏的垂愛，他獲得了司令官的職位。但謠傳馮氏的態度正在動搖着。南京政府用重餌誘惑馮氏，因為他的防地是西北的咽喉，控制着潼關要隘，向東又可直趨西安。我們踏進「叛省」的時候，也許會落在中央軍的哨地裏。但這是一個機會：我們必須加以利用，因為要是走另一條可能的路線——北面的路線，則在這個季候，至少要一個月才能達到目的地。

我們希望在旅途中會得到更明確的風聲。

另一個人走進房裏來，跟趙低聲談話。我們聽到『飛機』兩個字。這更有興味了。趙揚自得地轉臉對我們說：『明天有一架飛機到太原——從西安來的！我們也許可以搭這飛機到西安去。』

『這才是好主意！』頓熱心地附和道。『牠到太原幹什麼？』

『西北代表來看閻錫山。是一架大型飛機，可以坐六個人。』

『你可以領我們同坐飛機嗎？』我要知道是否可能。『當然可以，』趙溫和地答。『這是張副司令的飛機。』

如果這個計劃能够實現，我們明天也許便能到達西安。彷彿我們真的交運了。

從有家莊到太原的支線，是由一個法國公司經營的。這是很漂亮的小鐵路，小小車站建築物的頂上有鐵柵欄。我們帶着行李擠進一間二等車的小車室，一張大椅子佔據這室內大部份地位。車窗的玻璃上畫着一個象徵信實的花結和一小球瑰蕊：一種精緻的法國風。

同別人說話的責任，大都由頓和我擔負，因為我們的中國朋友竭力使自己不為別人所注目。我發覺茶役能用純粹巴黎音說：O.M. (是) 和 Non (否) 很覺愉快。可惜他的法語只限於這兩個字。

月台跟中國一切車站月台一樣，密布着軍警。『他們都認識我的，』趙從角落裏低語道。我又疑惑他到底是誰，這位瘦弱的年青的東北人，神氣稍稍有點強悍，眼睛——一個夢想家的，也許是一個熱狂者的眼睛——不時露出微笑。他是誰？也許我們還是不知道為妙。

剛要開車的時候，一班奇怪的青年人出現了，他們帶着一面綢製的大旗子，小心翼翼地

把這旗子拿進我們的隣室。他們中有四個男人，大概是書記或學生之類，有兩個短髮的女孩子。我們後來知道他們是南方的代表團，帶着旗子和食品到綏遠去慰勞英勇衛國的戰士們。他們是從廣東來的，他們的談話大都聽不懂。但兩個女孩子是很可愛的。

我們終於離開了車站，望着城牆的習見的景色，望着一座高出城牆的破舊的古塔，差不多在離開中國任何鄉村車站時都可以望見此種古塔。最初跟我們同房的，是一個便衣警察，這原是很不好的事情。但看他的睡態顯然沒有什麼惡意。我們用英語談話，這是很安全的；頓和趙用日語談，這更安全了。旅程是很大平的。

到了直通山西的要隘——娘子關，火車在懸崖絕壁間沿着一道河床爬行。我們從這裏可以望見長城——一道石工的建築物沿着小山的山肩蜿蜒着，有直聳雲霄的堡壘。在遠遠的下面，綠色的雪水衝擊着岩石，我們的車子滾過一堵高高的橋，懸崖絕壁就在面前，在牠們的頂上有一根無線電桿和士兵們的小小的形像，有如用鋼筆描成的速寫畫。穿過橋，我們就到山西境。

這一帶地方是日人所看想的煤區，鐵路的路基上蓋着亞炭，顯得墨黑。土山從黃河的流域聳了起來，有如露台；許多黃色的村莊擠集在這隆起的平面上，宛如堡壘。這在冬季是一個不毛的省份，但小山的形狀却很整齊而且美麗，有如保羅，那士（Paul Nash）的風景畫中的小山。農民們都穿着黑色服裝，因此站在黃色田野和小山上的人類的形像，成了非常凸出的浮雕。這是真正的西北，充滿黃土的西北。

當我們的列車駛向太原，在凜烈的寒風中穿過空曠的平原時，天色漸漸暗下來了。雪堆

點綴在鐵路的旁邊。從廣東來的一班人被雪堆迷住了；他們從沒有看見過雪，利用火車停在路邊的車站時的每一分鐘，互相拋擲雪彈。他們依然不相信這真是雪。

我們所看見的太不像是密布着衛兵的車站。旁邊有一個空曠的方場，充滿了暮鴉的喧嘩。山西大旗幟，宛如前世紀紀念遺物，有褪色的窗幔，有拱形圓頂的大房間。我們在一個法國式的食堂裏用飯，一個頭髮蓬鬆，蓄着黑鬚，像二二三三影片裏的一個角色一樣的矮小的人，正在我們的隣座熱騰騰地喝着苦艾酒。

我們精神煥發。趙已在旅客簿上做了一番偵查工作，說那架飛機的確已經到了，而東北軍代表中有兩位剛離開這裡，到北平去了。當前的問題就是怎樣去找關係。

我覺得我們三人合住的房間很像紅衣主義的寓所。地面是用紅黑色的磚鋪成的，天花板籠罩在陰影中。有一間雖然古舊但很寬的浴室；趙說要去洗澡。他說洗澡怪舒服的。

額出去看一個朋友，打聽消息。

警察還沒有來檢驗我們的護照。我正在腦子裡編造一篇華商告訴警察的合理的故事，作為我們的中國旅行津貼太原的藉口，而趙自己却在這時神秘地從浴室現了出來，走近我的身邊。『我要訓教你一下，』他說。

他看來非常年青，襯衫沒有扣上，濕的頭髮披蓋着他的前額。簡直看不出他有一個妻子和一個八歲的女兒。

我說，如果必要的話，我很願意貢獻意見。但我簡直不知道他要跟我商量什麼。

『今天晚上我去看閻錫山好嗎？』他問我。『我想，如果我能會見他，我便能勸誘他變』

應我們在西安的建國。

這些話在我聽來是很可以樂觀的。我知道閻氏的大名；除非有確實的利益，他大概是不容易接受別人的勸誘的。趙本人並不認識閻，但由於別人的介紹，他可以跟閻的一個秘書見面。

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問他一句話，他便告訴我全部的故事。

趙是一個被騙過的人物，別人懸賞購買他的頭顱。他是張學良的一個秘書，兩年來一直跟張氏同在西安。他是激烈的少壯派的一份子，這一派人在一二·九事變前幾個月非常活動。那一年十月間，蔣委員長第一次到西安時，他竟公然攻擊蔣氏，這是疏忽之至。這件事產生於東北軍校。

我記得自己曾在上海聽到一個關於有名的東北軍校學生集會的故事。張學良下令逮捕這個演說者，而演說者並不怎樣困難地逃出了西安。這個人叫苗劍秋；那時以後，所有中國報紙都攻擊他，說他是西安事變最危險的罪魁之一。在北平，在全中國，警憲們正在偵查他的蹤跡。那麼這個人就是……？

他用一個指頭指着自己的鼻子，簡單地說：「我就是苗。」

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這時候，我們的朋友在太原或是在西安以外的任何地方，顯然都很危險。要是他去看閻錫山，那簡直是發瘋。認識他的人太多了。任何偵探或官吏都有認識他的可能。而他混在我們的伴隊裏，這至少使我們也很為難。

我們一見面就很喜歡他，雖然我們看出他易於衝動，非常神經過敏。後來我更加瞭解他

了，於是除喜歡之外，還羨慕他、尊敬他。不管人們怎樣評判他，他顯然是十分誠懇的老實人。

各報說他是共產黨員；但凡是認識他的人都不能相信這個。他的內心從來不為紀律所屈服，他是一個先天的革命家，認識不很清楚，富有血性，絕不關心金錢或職位。他是日本留學生，日語說得很好。他有真正的東北人的抗日熱情，憎惡日軍佔領滿洲。他所有的生活目的就是要跟日本開戰，收復失地，收復他的故鄉。看樣子，他除非到西安去，大概不會活得很久。

頓回來報告消息，說明天回到西安的那架飛機，僅够閻氏的代表們坐，說有一團兵守衛着飛機場。我告訴他關於苗的事情。

「主呀，這些中國的愛國主義者！」他悲歎道。「他幹麼要說出來呢？我們既然知道了他是什麼人，就不能跟他同去了。」

這件事對於頓比對於我更壞，因為他所服務的新聞機關不願得罪南京政府；而且直到此刻，苗一路都被作為頓的秘書。除了跟苗分手外，似乎沒有別的補救辦法。浴室裏的水聲告訴我們：我們這位革命的朋友立刻又要跟我們在一起了。我們必須決定一個辦法。

「我不願離開苗」我說。「畢竟這是他到西安去的最好機會。他一個人走是不安全的。」

「好，這樣你的末日就要到了。我們最好想出一點辦法來。」

苗精神活潑地跟我們在一起了。我們在鎖着的房門裏開了一個緊急軍事會議。他留在太

原顯然是不安全的；警察隨時有來麻煩他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走黃河方面那條長路，如果還有機會搭機直飛西安的話。石家莊是東北軍的勢力範圍，在那裡，苗是安全的；在那裏，我們可以直接跟「叛軍」通信息。

我們最後決定頓留在太原，說他的朋友和他的秘書因有要事被召回去了。他過幾天可以經由潼關到達西安。苗和我回石家莊，我們在那裏再作計議。

我們的會議結束後，時候已經很晚了：苗已有好幾天沒有睡覺。在這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情的陰森森的旅館裏，我們受的刺激太多了。頓和我在不安的懸慮中度過了那一晚其餘的時光，等待着警察來打門。

四 東北的背景畫

這是一個寒冷徹骨的早晨，苗和我溜出旅館，走向車站。在太原僅僅住了十二小時，我們就往外退了。

車票由苗去買，因為他現在變為我的秘書了，我不得不假裝完全不懂中國話。這樣，萬一發生什麼事故，我們可以把時間延盪一下。他心緒不寧，神經有點錯亂。他企圖勸誘閻錫山擁護張學良的主張，結果沒有實現；這顯然使他很覺不快。

我們坐頭等車：爲的是不跟其他搭客混在一起，我坐在自己的角子裏，盡力裝出傲慢的態度；我發覺自己只要向好奇的警憲們看了一眼，就能制服他們。在中國一個外國人是佔一些便宜的。

我生平坐火車當以這次為最長久。作為一種經驗，這是怪有趣的，因為跟一個革命者一同旅行，並不是平常的事。我很知道中國的『恐怖』。知道我的朋友萬一被捕，會獲得怎樣的結局。在以『匪徒』稱呼共產黨員，以對待匪徒的手段對待共產黨員的國度裏，『共產』嫌疑的罪名已經修利害了。

我們一直談着話，簡直沒有停過口，因為這樣可以消磨時間，而且我也有許多事情必須問他。我問他西安的情形，張學良的為人，東北軍的情況，他曾同張學良一起工作，深知張氏為人。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對過去幾年中張學良在西安的言行的認識。

我需要一幅東北的背景畫，我從苗獲得了筆，她指明了冒着絕大危險的西安事變的全部要點。就是在中國，充份瞭解滿洲的悲劇的人也少得很。『東北』這個名詞有不同的含義。許多中國人以為所謂『東北』，不過是指少數粗暴的流亡者，他們流浪到長城以南，不容易謀生產，為着生活而不必妥地吵吵鬧鬧。在這些中國人的心目中，『東北』這一名詞是一個罵人的名詞，他們對於留在滿洲的幾千萬中國人淒慘的生產狀況，很少同情。但在流浪中的東北人，舊部軍隊，以及許多不能在『滿洲國』的五色旗下討生活的人，却懷着痛苦和憤慨回顧他們東北的家鄉，他們主張收復失地，他們是全中國最堅決的反抗份子。他們的不斷努力是要使他們自己的鬥爭變為全民族的鬥爭。

苗有種種談話寫的可悲的習慣，許多受過『學者』訓練的中國人，都有這種習慣。光是這個玩意也可以使我相信他決不是共產黨員。我徬徨不安地望着他的筆尖在紙面上滑溜。這在他是一種發洩情緒的舉動，但在我却是一種無盡的焦慮的泉源，因為隨時都有偵探跑進

車廂的可能。當每一張紙寫滿了字的時候，我就側過身子，把牠撕成碎片，塞進我的衣袋裏。當我們到石家莊的時候，我變成一個活的字紙箋了。

但從這樣奇異的談話中，湧現出一個明晰的故事。關於張學良的為人，原有許多公正的描寫。但要充分瞭解這個人物，瞭解他的政治生涯的發展，瞭解他在西安事變後所號召的新政策，則根據他自己的人——知道他的優點和弱點的人對他的認識而加以考察，那是十分必要的。由於出身的關係，他在過去十年中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一個顯著的角色。目前的局面是由過去十年發展成的，下面就是關於那一期間某些年頭的報告。

北平古老的南海曾是帝皇們的樂園，就在這南海附近的一個亭閣裏，在他二十八歲的生日，張學良醒了過來。他年紀青青，無憂無慮，毫無責任——一個暴戾軍閥的公子。他的父親張作霖（他有着一般領導和陰謀的才幹，在滿洲全境建立了鐵一樣的統治，但在向長城以南的進軍，總不能獲得理想的成就）由於國民革命軍北進的威脅，已在前一天離開北平，到瀋陽去了。他永遠沒有到達家鄉。

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上午九點鐘左右，電報到了北平。當兒子讀着電報的時候，白鴿們正在海上盤旋着，纏繞在牠們頸項上的小小哨子的淒哀的聲調充滿了空中。無憂無慮的日子是完結了。

四小時前，當張作霖的列車穿過瀋陽附近日本人經營的鐵路上一堵橋樑時，一顆炸彈在張氏的特備車輛上炸裂了。日本對滿洲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那天下午張學良離平北上。簡直沒有人知道他離開北平；張作霖的死訊是那樣被保守着。

秘密，甚至日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陰謀是否獲得了成功。張學良到瀋陽了：直到部隊被調回關外，才宣佈張作霖的死耗。而以乘機取巧為能事的日本外交政策，這時發覺自己受到阻礙，因為牠至少預料到自己將引起對方的反抗。牠不得不跟這個新統治者（他經驗沒有父親那樣豐富，應付事情不及父親那樣圓滑週到）他是以魯莽出名的青年，在他自己的本家也決不是一個家長、相鬥爭，但這個統治者就不怕威脅，又不為利誘。

這是過去的歷史了，但最近的事變又使人回想起這一事件。在當時，許多人都不知道這個暗殺的陰謀到底是誰主動的。也許是國民黨人，也許是日本人。關於這，張學良一開始就知道得很清楚；他懷疑這與他父親的參謀長楊宇霆有關，楊氏公然與日人勾結，同時也是他自己的死敵。雖然張學良穿的是西裝，坐的是汽車，但是離開滿洲的平原，到底不過二三十年的時間。那種為父復仇的原始的義務，與時俱增着。

關於張學良在少年時代經歷妄動的事跡，也有生動的描述。他是東方的卡羅爾皇子，直到今天，人們依舊把他看作這樣的人物。但他的早年生活並不是沒有趣味的。

他會想做一個學者，他直到此時都受家庭教師的教育，他在北平開始進北京大學，讀了一個短時期的書，那時的北大，是五四一運動的發源地，是全中國最革命的文化中心點。但他父親不贊成他在北大肄業，逼他回到瀋陽進軍官學校。張作霖的兒子必須做一個將官。

小張以軍校畢業生的資格進入軍隊。他很順利地高陞着，這原是意料中事，但也不是毫無理由。他機敏、聰明，十分和善。他這時在瀋陽外國教士的隊伍中結交了一批朋友，他是

青年會的一個活動份子。他們竭力要使他成爲一個基督教徒，而張氏本人也不是沒有接受一種西洋宗教的意向，他已養成了許多西洋習慣。如果把這種改宗會引起怎樣的後果這一問題加以推究，倒是怪有趣的事情。外國人在中國領袖們的隊伍中所施用的戰術，並不是沒有成就。

這個從瀋陽軍校畢業的青年軍官，立刻就在無盡止的內戰中學習實際軍事經驗，此種內戰二十年來一直蹂躪着華北，張作霖不顧危險，趁火打劫。張學良在軍隊裏最親密的朋友似乎只有兩個東北軍的將領郭松齡和韓麟春，這兩個人的聲譽完全不同。郭氏顯然是一個能幹的將官，是最初改組東北軍的諸將領之一。他年紀比小張大，但成爲小張的知己，似乎有些像巴雅。（十六世紀法國勇士）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基督將軍』馮玉祥舉起叛旗，反對專制的張作霖，不幸郭氏亦牽入漩渦，結果被捕，雖有小張爲他求情，請保全其生命，但終於被鎗決了。

吉神一走，惡神就來補充他的位置。另一個能幹的將官韓麟春，比較輕率得多。一九二六年，他同張學良進兵河南，沒有成功。此次進兵的後果之一，就是引起反動的楊宇霆的猛烈攻擊，楊氏在他父親面前毀謗他的兒子。小張幾乎失掉軍職——他這時是個旅長——有好幾個月不敢見他父親。

但進兵河南的另一個更不幸的後果是小張在這時候跟韓麟春一同吸上鴉片。他立刻認識了此種惡習慣的危險性；但在不高明的醫藥指導下努力戒煙的過程中，他又愛上了嗎啡和別種壓癮的毒品。就在這愛上毒品的時期內，小張建立了他那優柔寡斷的大名。如果他當日不

吸鴉片烟而成爲一個基督徒，即滿洲的歷史也許會大不相同。

張學良在父親死後回到瀋陽的時候，他自己的地位還沒有確定。他原是第三第四兩軍的司令，而三省會議又給他東三省宣撫使的頭銜。但同遺產一起，他還父親承受了某些反日的行爲。而一個由高級軍官和參謀組成的强有力的集團，以張氏的舊敵楊宇霆及其密夥常陰槐爲首腦，公然主張滿洲獨立，一而與日本合作。這顯然只能在南京和東京間選擇一個。小張毫不躊躇地決定了。

他對於中國的內戰厭倦透了，他堅信東三省是中國的一部份，理應跟中央政府建立密切關係。南京政府給他一個東北邊區主任的職位，以資鼓勵。楊宇霆及其黨羽主張在華北繼續作戰，但張學良却明白表示態度，主張國內一致聯合，反對內戰，他把東北軍調到平津一帶，實踐他的主張。華北對中央軍的抗戰瓦解了，南京政府就把全國海陸空軍副司令的職位給與這位年輕的東北軍領袖。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經過以日人爲堅強後盾的反動派的熱烈反對後，滿洲全境的五色旗，終有改爲國民黨的旗幟了。青天白日旗飄揚在整個的東北。

但在瀋陽一個城門上，依然招展着袁世凱的已歸烏有的土國的五色國旗。瀋陽是親日派首領楊宇霆的巢窟，楊氏自稱「滿洲第一人」，一現在是張作霖的所有參議中最有勢力，最反動的一個。這面旗子證明反動勢力仍在活動，仍然很有勢力。

反動派一向把小張看作小孩子，盡量給他生活上的享樂，而在政治上，則盡可能的剝奪他的權力。這是皇家對待少君的傳統的陰謀，而在過去，的確獲得相當的成功。但這位「少

君。到了發揮自己思想的年齡了，他對於自己的政策有非常明確的觀念。他一開始就在聯合南京政府的問題上向反動派挑戰。現在兩派的鬥爭進行到開發滿洲內部的問題上了。

小張的綱領真正是進步的，立刻遭受對方的反對。他鼓勵向東三省境內移民，特別強調發展工業和交通。擴充瀋陽大兵工廠，直到他成爲遠東最出色的兵工廠。張氏的意思是要使牠成爲『生產的，』成爲一個工業中心，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改組軍隊。直到牠成爲全國設備最好訓練最好的軍隊。綱領內還有發展交通的大計劃。

張氏認爲交通是滿洲全部經濟的鎖鑰。除中東路外（一九二四年後，該路爲中蘇共有，）滿洲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鐵路都爲日人所有。小張決意自造鐵路，以與日人競爭，藉以粉碎外人的壟斷。日本堅強反對，並提出秘密條約，制止此種行動。關於鐵路的爭執，接連引起許多麻煩事件。不但要跟日本衝突，還要跟日本的滿洲同盟者衝突。

因爲楊宇霆是兵工廠廠長，而他的夥伴常蔭槐是東三省交通委員會委員長。

兩派的磨擦，還有其他原因。小張堅信鼓勵教育的必要，即使由反對派來辦理，也應該答應的。教育始終是一種穩當的政治賭博。不過只有小張真正去玩牠。他從父親的財產中提出鉅款，在瀋陽設立東北大學，在全滿廣設中小學。他無疑地樂於做一個慈善的開明的學術保護人。但當地發覺奸刁的楊宇霆從五百萬元教育費中吞吃了三百萬元，作爲開鑛的資金的時，他真是憤慨極了。這是中國官場最普遍的傳統，不過楊宇霆在那時候玩這把戲，也是够危險的。小張有時到底是張作霖的兒子。

分曉的時機終於到了。當楊宇霆的尊貴的父親用一種超過東方慣例的舖張在瀋陽做壽的

時候，年輕的統治者張學良是所有來賓中最謙恭有禮的一個。兩天後，小張在自己家裏設宴招待楊宇霆和常蔭槐；主人非常客氣，怪優雅地撫弄着一條手帕。衛隊突然衝進房來，兩個客人立刻被槍殺了。

當蔣介石將軍在西安被禁的時候，人們又回想起這個動人的事件。許多人相信蔣氏已經受到同樣的待遇。

有一個千真萬確的故事：在設宴的前夜張學良拋擲着一個錢幣，決定應否殺死他的仇敵。這錢幣是一塊袁頭洋，一面有這個做皇帝夢的政治家的像。『袁頭向上，他們就得死，』小張說。果然袁頭向上。小張還決不定，再擲一次，又是袁頭向上。

『你在幹什麼？』他的夫人從房間的另一端問。

『我在解決應否殺死楊常的問題，』她丈夫答。『兩次都是袁頭向上。』

張夫人渾身一震，說至少必須擲三次，才可以作最後決定。這一次該以袁頭向下為憑。張又擲了一次。果然袁頭向下。於是就決定了。

這一塊孤單的銀洋很光榮地被保存在張學良私宅內一隻大錢箱裏，作為一種紀念品。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瀋陽以後，自然希望在張氏公館裏撈一筆大財。因為張家私財之多，簡直使人難以相信。

日兵帶着滿腔熱望找到了這隻錢箱。開了箱，他們發覺箱內只有這麼一隻大洋，大為驚訝。

日兵怎樣處置這隻大洋，不得而知。但即使五年以後，張學良在西安依舊保存着這隻大

洋，他大概也不會再用牠來卜蔣介石將軍的性命的，因為這是一個不同的張學良了。

張學良統治滿洲的短短的時期，是一幅更熟悉的背景畫。他的政策一向是爭取國內和平，聯合南京政府（關於對日的外交政策，他常向政府貢獻意見。）實施『排擠』日本的經濟網領，拚命建築鐵路。日本的野心家們，特別是關東軍的本莊繁將軍，終於忍耐不住了，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實行進攻。當時只有一種悲慘的假抵抗。

東北軍——牠的人力資力都超過決心進攻的少量日軍無數倍——的失敗，往往被人看作牠的司令張學良的失敗。瀋陽事變爆發時，張學良身在北平，他的大部份軍隊都在長城以南。當閻馮再度在華北舉起叛旗的時候，張學良率部入關援助蔣介石將軍與南京政府。佔領北平以後，張氏依舊執行維護國內和平，阻止內戰的政策。他那時當然是忠於蔣介石將軍的，而這一片忠心却使他（同時也使中國）犧牲了滿洲。

當日軍突然攻擊瀋陽的時候，張學良進在北平協和醫院裏，他害了傷寒病，幾乎斷送了生命，此刻剛剛痊癒。（人們懷疑他的病症的真實性，以為這不過是掩飾烟癮的發作吧了，但醫院的紀錄可以證明他病症的嚴重。）事變的後一天，他從醫院回到家鄉，但此後幾個月中，他一直沒有完全恢復健康，那幾個月是註定東三省的革命運的苦難的日子。他過後嚴厲地責備自己在這時期的游移不決。

東北人老是說九月十八日是『賣國的日子』。他們對於自己的年青司令的憤恨，沒有對別的一些人那麼厲害。他們斷定張學良不過是服從南京政府的命令，——避免足以加重危機的抵抗，——等待參與凱洛戈公約和九國公約的列強的決定。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張學良自己最初

也認爲「九一八」事變不過是一個新的「事件」，「像一九二六年日軍佔領濟南一樣，可以用調停來解決的。

近年來中國對日軍侵略的最有力的反抗，就是對於最高命令的反抗。第二年一月間，十九路軍向全世界證明中國軍隊至少人掙人是拚得過日軍的。但十九路軍終於被那同一的命令撤回了，這命令曾在四個月前「避免了一種危機」，同時也失掉滿洲。而一年後熱河的故事的悲劇性益發明顯了。

東三省失陷後，保衛熱河成爲全民族的榮譽事件。保衛熱河的領導權被給與有名的湯玉麟他退兵時用軍用汽車裝運鴉片烟的可紀念的故事，已成爲中國諷刺家們的辛辣的題材，熱軍的全部潰敗，是南京政府政策的弱點最後的暴露。「不抵抗」政策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公然被丟棄了；蔣介石將軍「稱自己準備爲保衛華北而作崇高的犧牲。據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報告，當時近五十萬政府軍正在中國內地跟共產「匪軍」作戰，共產軍當局再三提議國共兩軍停戰，以增強抗日力量。但政府始終沒有援軍派往華北。當一九三三年二月日軍進攻熱河的時候，守軍潰敗得那變慘，到三月四日，侵略軍就佔領了熱河城。

那時候湯學良的地位是怪有趣的。他身在北平，湯玉麟部四千左右東北軍駐在熱河城內，其餘部隊從北平北而開拔，沿着鐵路開往山海關。有一個時候，湯學良對於國聯，或對於抵抗強權的正義的力量，也許有一點信仰，但現在，他老早失掉這種信仰了。根據他自己的報告，熱軍第一次挫敗之後，他打算率領全軍進入熱河，打個明白。

但這時候，蔣介石將軍秘密到了保定，匆匆開了一個會議。說到中國的災難時，蔣委員

長運用那個熟悉譬喻，把中國比作一艘觸礁的船。『船載得太重了；如果要救出那隻船，必須卸去一些押輪的東西。』彷彿張學良就是那押輪的東西。

他呈上一封頗爲動人的辭職書，辭職書的草稿就在保定蔣委員長的特備車子裏寫成的：『……綜觀目前事實，經與蔣介石將軍會商之後，深信我在此時辭職，將有助於中央政府，使牠益臻強固。……此次去職，望我國人信我動機之誠懇，瞭解我不論如何錯誤，却始終爲國家福利而努力。』東北軍的統率權移交給蔣委員長；牠立刻被調到豫南，而張學良出國養病去了。從政治手腕的觀點看來，蔣氏對東北問題的處理，是很高妙的。從那時直到西安事變，他的聲望日益增高，未曾受過一次顛挫。而張學良的聲望却彷彿一蹶不振了。

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與張學良告別了。這位臉容蒼白，眼神愁慘的雅片老槍，不時在各種報紙的遠東新聞欄裏出現，『雙十二』事變後的那些日子裏，他的肖像在許多報紙的第一版上沉鬱地凝視着。這個故事依然活着，就是在他也沒有死滅。這位喪失了東北王國的人物，會發覺自己要獲得祖國民衆的愛戴，並不是容易的事。

張學良出國以前，在上海住了幾個月，拚命戒煙。在戒煙的過程中，他的外國朋友們都幫助他，特別是他往日的顧問端納。端納在西安的談判中又扮演了一次和事佬的角色。戒煙的成績很不壞，再在外國住了幾個月，煙癮完全斷絕了。張氏回國的時候，完全是另一個人了。

滿洲的故事從沒有全部被暴露出來。滿洲事變後的幾年中，世人才開始認識在那些九月的日子裏到底喪失了多少東西。阿比西尼亞拉調了許多人的眼睛；在今天，一般人覺醒的程

度，可以從各部隊的驚慌中看出來，可以從各國的整軍計劃中看出來。『集體安全』在一九三一年是一句十分公允的名言。直到今天，牠依然不是不足道的笑話。

在那正確的外交文件——『李頓報告書』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東北人民的悲劇。（關於那些敢於在李頓調查團面前提供證據的中國人以後的遭遇，應該寫成另一通報告書。）那個悲劇絲毫沒有東北軍的份兒，牠已退出了自己的家鄉，沒有抗敵的機會。但在東北白山黑水的背景面前，戲還沒有演完。因為在那些苦難的年頭裏，牠至少找到了自己的主角。

瘦小精悍的騎將軍馬占山恐怕就是這戲劇的主角的前身，他在冰天雪地的齊齊哈爾對於侵略者的英勇抗戰，激起了全世界人士的騰海裏的波瀾。他此後變成了中國一些最優秀的新作品的題材。在常受魯迅贊揚的上海青年藝術家的木刻或繪畫的展覽會中，你可以看見他戴着皮帽，來廂鎗在白雪的掩映下顯得漆黑。他還不是中國革命的赤色衛士。他是滿洲的義勇兵。

我們到有家莊的時候，天又黑了。在夜間到達一個警衛森嚴的車站，彷彿我們所有的白天都完結。我們帶着失望的情懷回到那間熟悉的旅館。西安似乎顯得格外遙遠了。

我們踏進二樓一個房間的時候，我們聽倒行軍的聲音。苗跟着我到了窗前。一隊穿灰色軍服的兵士正湧向自己的營房，在慘淡的燈光映照之下，顯得黑黑。他們湧過窗下的時候，突然合唱起一首愛國歌來。歌聲是爽朗的，斷斷續續的；但也有些奇異的懷鄉的味兒。

『這是東北軍，』苗在我後邊說。我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那天晚上，我們費了許多小時討論計劃。現在還有坐飛機的機會，只要我們能到太原去

時。但要等西安的回音，至少需要一天工夫。

有一個人那天晚上在我們房裏留得很晚。我不知道他是誰；但他是個滿洲人，有東北人的大頭和寬而且高的額骨。他寫過一首新的東北歌。

他在薄暗的房間裏低聲爲我們唱這首歌。這是我此後時常聽到的一首歌。牠開頭是這樣的：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

滿洲遍野的大豆高粱……

牠於是說到『九一八』，『那賣國的日子』；說到農民們在日軍鐵蹄下的痛苦；說到回鄉的

渴望：

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那年那月才能够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呵，爹娘呵，什麼時候才能够歡聚在一堂！

中文的詞句比英文更富於優美的情詞。苗被這首歌迷住了，他們二人合唱了幾個鐘頭，因爲苗要學會牠。最後他把詞和曲都記在心裏了——有一種悲哀的，美麗的調子。另一個人溜到黑暗裏去了。

苗回頭望着我，他的眼睛是濕潤的。『我們到西安的時候，我要對蔣介石將軍面前唱這首歌，他一定會流淚的。這樣，我想他會改變他的心。』

我疑惑着。

五 重赴西安

一天後，我們再度從西安出發。『這條鐵路上的人們一定都認得我們了，』當我們又搭開往太原的早車時，我這樣說。苗快活地樂笑着：『兩夜的睡眠使他精神煥發了。』

『他們以爲你是幹大事業的大人物呢！』他說。『你是外國人，你坐頭等車。你有一個祕書。很有面子』。我希望他說的是事實。在頭腦單純的西北人看來，我們在過去三天內的行動一定顯得非常可疑了。

但我們並不是到太原去。我們在前一天接到額的信息，說他不能搭飛機到西安去，只好搭火車到滄關，希望能通過滄關在防線。這是兩月以來他最後給我們的信息。當我回到北平的時候，我知道他不能通過。邊境上中央軍的防線，只得折了回來，病了幾個星期，彷彿是有傳染性的熱病。我們更難達到目的地了，但如後來爲事實所證明的一樣，我們的運氣却比誰都要好。

我們的計劃是在離太原還有兩站的地點下車，太原對於我的朋友苗君絕對不是安全的地方，嚴密的查問可以證明這一點。如果西安再有感覺來，就一定有信息帶給我們。如果沒有飛機，我們就在當夜的機車到候馬，再從那裏向黃河行進。

我們已經走了三次的旅行實在是太熟悉了。但一路並沒有發生事故。另一個朋友在三等車裏跟我們在一起。他會指歸我們歇夜的地方。

那天下午，高舉着一直把鼻子塞在車窗的玻璃上，到了傍晚，他對我說：「一下站就是了。」我們買票是買到太原的。因此當我收集行李的時候，車內的茶房表示非常驚訝。兩元鈔票滿足了他的好奇心。

列車開進一個小站，站上只有沒精打采的警察們守衛着。我們匆匆下車，立刻穿過鐵路線，把我們的物件堆在一起，等待着火車開過去。那個神秘的朋友突然領同兩個鐵路工人出現了。

「跟我們走。」他簡單地說。我們跟着他們沿一條支線走去，走到一輛孤單地躺在換軌器旁邊的絞轆車跟前。大家都爬到車上，兩個工人對着槓桿彎下身子。換軌器喀喇一響，我們就靜悄悄地滑進黃昏的薄暗裏。

天氣冷得可怕。我們坐在狹窄的木板上，牙關格格作響。我一點不知道我們往哪裏去。風從邊上襲來，我們羨慕兩個工人在我們後邊有規律地絞着車子。彷彿過了一個世代，我們的絞轆車才離開鐵路線，折入一個工廠的院子裏。鐵門在我們後邊轟嘩地關上了。大家的呼吸就比較自由得多。

在這座小房子裏，我們受到主人的歡迎：一個淺淺的火盆發出室內的熱力。兩個房間擠滿了孩子們，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外國人。因此當我用他們聽不懂的中國國語對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面直羞昏了。一個臉皮打皺的老婆婆正在吸着旱烟管。房內沒有什麼擺設，但很整潔，至於新生活運動當然是不够格的。

食物拿來了——熱氣騰騰的麵食，蹄膀，甚至還有大米飯，我突然覺察到，這種接待比

我在大城市裏享得到的官方豐盛的宴席更珍貴得多。因為上海或南京的一個宴席的費用，够這裏全家生活一年。

那天晚上住在一個工人的小屋裏，真是一場愉快的插戲。我開銷了一切被籌錢，對着孩子們的迷惑的眼睛露出，雲多毛的手臂，喝了無數杯劣味的茶（主人給我們茶時不住地道歉），我們的朋友回來了，帶來一些消息。西安附近正發生戰事，飛機不能夠來。我們必須搭夜車前進。

這位朋友是一個富於機智的人，他似乎無論什麼人都認得的。在我們動身以前，他已預備好路上吃的食物：餅乾和五香牛肉。他還僱好了一個僕人，這是很可以驚異的，他說爲了『面子』，我們至少得有一個僕人，而且這個僕人很有用處。

僕人是一個斧頭臉的東北人，曾在東北軍裏當過兵，他是這村莊裏的朋友們『借』給我們的。他姓李，他願意同我們到西安去。

我們可以到下一站搭開往瀋陽的慢車。我們把行李堆在洋車裏，房主人很有禮貌地跟我們告了別。李在黑暗裏做前導。我們必須穿過這洞村莊，連朦朧的月光都看不見。苗在我前面的洋車裏唱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我們靜悄悄地穿過荒寂的村莊，到了空曠的田野，狗在後邊狂吠。狹窄的小路兩旁現出堆堆的土坎。一列火車在遠遠悲哀地鳴叫。我覺得真正的旅程終於開始了。

我們站在漏風的電車裏，凍僵了。我身上的服裝對於這樣的旅行至少是相當配稱的：腳穿長統靴，頭戴蒙古人的皮帽。苗的服裝正像一個秘書的服裝，穿着黑色上裝，套着不配

稱的鞋罩，披着大衣，抖擻着，活像一隻豎起羽毛便鳴鳥，兩腳交替地移動着。李穿着一件棉袍，一雙時式的舊皮鞋。這過云一定是他的主人穿的。他應該是三個人中最覺寒冷的一個。但他沒有怕冷的表示，只是兩手塞在袖子管裏，神氣很兇暴。

火車到來的時候，搭客是那擁擠，彷彿全中國只有這裏一個鄉村車站。我們竭力擠過不大服貼的車門，擠進黑黯的小小的車箱，共有三長排坐位。車壁是用不整筋的木板構成的，最大的罅隙，就用麻袋掩襯在裏邊。有兩個火爐，一頭一個，還有一盞孤寂的煤油燈。我們顯然得過一個不舒服的夜晚。

我們運用高妙的戒術，在中排座位的中央佔領了一塊地方，這裏離開兩頭的火爐是最遠。苗把一包一包的食品堆在他和我的中間，這是中國的老習慣，凡是你能佔得的地位都被牠們塞滿了。他怪聰明地點起一支洋燭，把乾餅乾餅乾罐頭的角子上。李爺願站立在火爐旁邊，不時從爐旁的地板上拿一些煤拋進爐裏，一邊抱怨山西鐵路設備的簡陋。『閩錫山很會剝削旅客，』苗從格格作響的齒縫間瀉出這樣的話。『你看山西的一切都是爲賺錢的。』

這是我平生所碰到的最寒冷的夜晚之一。列車隆隆地向南滾着，不時在各小站停靠。冷風通過車壁的罅隙，奏着淒厲的輓歌。每隔幾分鐘，總有一個農夫站起身來，走到火爐跟前，烘他的腳和手。我們同車的旅客們不再怎麼注意我們了；同樣的寒冷和同樣的不適意，使我們打成一片了。

但連這種苦楚也不讓我們安安靜靜地忍受。大約羊夜時刻，列車稍稍停了一會，門外突然湧起一陣喧鬧，車門被狠狠地打開了。兩個穿老羊皮大衣的兵士闖了進來，很不客氣的攪

擾着搭客，在我們的正對面清出一個地位。一個穿皮大衣的大塊頭堵塞着車門口。

苗向這位新來的旅客迅速地一瞥，低聲跟我說：『中央軍！』他翻上自己的衣領，拉下他的帽子蓋住他的眼睛，直到他看來活像銀幕上的陰謀家。軍官是一個紅臉孔的人，挾着一個黑色公文包，他在這種時刻搭上內地的列車，一定有很重要的公事。

我看出他是一個校官。他有好幾隻手提箱。一隻放在坐位上，一個兵士小心翼翼地把它一點一點的洋燭黏在這手提箱上邊。這新來的軍官嘆一聲氣，放癱身躺了下去（所有旅客中只他一個人有這樣的福氣，）把公文包當作枕頭。他從衣袋裏抽出一份摺起來的報紙。他在燭光旁邊細看着報紙。

苗首先抓住機會移身到火爐旁邊，蜷伏在那裏，臉浴在陰暗中。過了一息，我也跟了過去。

『你以為我們這位軍官朋友是什麼樣人？』我問苗。火車的軋軋聲掩蓋了我們的談話。他凄然微笑着。『他正在讀着關於我的消息。』他回答。『他也許到潼關去的。他說不定是個特差。』

『他有認識你的可能嗎？』

『我想不會的。但我很不愉快。』

我也很不愉快。

軍官看好了報紙，向週遭看了很久。他的眼光帶着一種寬容的關注落在我的身上；我因為是外國人，特別觸目。接着他的目光又移到苗的身上，苗的頭垂到胸膛，好像喝醉了酒。

我猜想自己非跟軍官談話不可了。

『你到哪裏去？』軍官突然問我。這是旅伴們普通的應酬話，沒有什麼特殊用意的。

『候馬』

『幹什麼？』他這第二句問話是我預料到的。

『去看看一些朋友，傳教的朋友。』我不知道是否有傳教師在候馬，但我只能這樣說。這是外國人在這樣時候旅行的最好藉口。『你到哪裏去？』我回問了一句。

他告訴我的地名對我毫無關係。但他顯然很注意苗。『我的朋友倦透了，』我對他說：『在這火車裏不能好好睡覺。』我用空洞的聲音打着呵欠。

軍官瞭解我的示意。他又直挺挺地躺着，立刻發出剔聲，頭在綠色手提箱上有規律地撞擊着。他把公文包墊在一隻肩膀下面。

那天夜晚彷彿永遠不會完結似的。每到一個較大的車站，一個護兵就喚醒那位軍官，軍官就走到疾捲着寒風的月台上，跟在十分謙恭的屬下談話。停車的時間愈弄愈長了。

後來，黎明終於出現了，但人們還沒有真正覺察到牠。大多數旅客對牠沒有什麼印象，他們昏昏沉沉地躺在那裏，活像一蹶不振的泰坦人（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神族，後被阿林比亞諸神所滅。）的模樣。但至少牠使我們可以看看一些東西，除了那位中央軍軍官的不雅觀的睡態外。

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度。全中國充滿了古跡，而此刻我們車子所經過的汾河流域則是中國歷史上最古的戰場之一，有圍着城牆的古城從紅土的地面隆了起來。汾河流域是在蘇格拉底

（雅典哲學家，生於紀元前四六九年，死於紀元前三九九年）前二千年那些驚心動魂的大事件的發生地，這些事至今還沒有被人們所忘記。這兒埋藏着幾個中國最古的帝皇，他們的墳墓在英國的彈弓家們開始吟咏貝奧武甫夫、用古代英文寫的史詩，作者及該著作產生年代，均未詳，大約在七世紀。以前，就崩壞了。這一帶地方每個古城都有自己的故事，現今黃包車夫們，因為看了中國的舊戲了！在短時間的表演中喚回古代悲歡離合的氣息的舊戲都熟悉這一類故事，沒有誰知道亞塔爾（五世紀或六世紀英國的皇帝，但此係傳說，殊不可靠。）的坟墓；又有誰知道威爾（Wainib）的屍骨埋在哪裏呢？但中國記得三代帝皇堯，舜，禹的坟墓；而華中華北各省至今還布滿了四千年間換朝易代的紀念物。

中國歷史的膠着性，殊足驚人；但只有靜的心眼兒才能把這濶博的東方文明看作靜止的不變的東西。大禹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真實的「英雄」，但同時也是歷史過程中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他曾在河南實行治水，淤成黃河水道，使逃到山上的人民又能下山耕種平原的沃土。水道管制是中國生產方式的主要特殊姿態之一，牠是爭取一個農業的亞細亞社會的生存的必要條件。現代某些經濟學家建立了一種用經濟眼光去看中國歷史的理論，這一理論可以說明無盡止的換朝易代的內較的意義。如果懂得中國經濟的真正性質，則朝代的興亡就不僅是一幅供美術鑒賞家們欣賞的着色的畫卷。只看這樣中國社會的發展程式以及通貫於衝突和鬥爭的四千年間的連續的過程，才能明瞭地顯現出來。

苗和我並排站在車窗跟前，他告訴我們正在經過的某些城鎮的名字。朝陽斜照在山谷上，把霧罩在長雲中的古拱和樹木照成金黃色。我們的列車開進一個小站，吶喊着向農民齊着

稀飯和饅頭。

『外國人！』苗突然說。三個傳教師走進了車箱——一個頭髮灰白的男子及其夫人，還有一個容光煥發，穿着藍色道袍的青年，一個跟他們同夥的中國牧師，顯出一副整潔的舒適的外觀，彷彿所有中國的改革者都有這麼一副神態。

他們一起坐在門邊，殘缺不全的同情和英國傳統的保守性把他們從其餘旅客分隔開來，彼此格格不相入。年老的一對，由於內心的煩悶，神情恍惚；他們開始在憂鬱的沉默中吃着夾肉麵包。年青的一個向我們投了好奇的一瞥，於是對那位中國牧師說起話來。『他們是到侯馬看朋友去，』苗抵聲說。

當這中央軍的軍官面前，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軍官又非常注意我們的動作了。顯然侯馬有很多傳教師。我覺得自己最好是跟那幾位傳教師攀談攀談。

年輕的傳教師在中國不過一年，但已充滿了對中國的熱情。我們談到山西圍繞着城牆的古城；談到這個中國『模範省』的農民生活，縣長們公然販賣鴉片，作爲一種戒雅片的藥品。談話當然又轉到西安，轉到蔣介石將軍的被禁。

這使年老的一對也加入我們的談話，他倆一直板着冷冷的臉孔，等待着加入談話的機會。

『那個可怕的東西張學良！』傳教師的夫人狂怒地說。『我們每天晚上爲委員長的安全祈禱。』

自從蔣介石將軍受了洗禮之後，他的最熱情的傾慕者就是在中國的大主教傳教師。

苗依舊帶着『坂道』的神情站在原來的角落裏，我又走到他的身邊。那個中央軍的軍官很使他惴惴不安。但突然間，這位睡了一大半早晨的軍官噤了幾聲粗重的鼻息，一骨碌跳起身來，同着護兵和行李、在一個偏僻的小鄉鎮下車了。

車內似乎空了許多。當我們的列車沿着河流穿過高高的積雪的小山時，車外的太陽燦爛地照耀着。當我們在四點鐘後到了侯馬的時候，太陽還在照耀着。

在月台上，那幾位傳教師被他們的朋友們高聲迎候着。就在他們交換着寒暄的掩護下，我們帶着行李穿過鐵路線，到了侯馬的城邊。我們立刻被黃包車夫，騾車夫，和腳夫的切熱的羣衆包圍住了。

看不見一輛汽車或公共汽車，我們一看那地方的外貌，就料到這裏沒有這一類車子。侯馬僅有的那輛騾腳汽車，是屬於河邊那間棉花廠的經理的，而他在兩年前把這輛車子帶回上海去了。道路似乎很不錯；故快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但我們所帶的物件太多了，而苗又不會騎腳踏車。我們只好在黃包車，騾車，或北平驕車中選擇一樣。

我們帶着強烈的不快之感，決定坐黃包車，黃包車大概跟這裏所有的任何車子一樣快，而且着實比較適意。我曾有一次坐北平驕車旅行了十分鐘左右，這是一種有蓬的，坐位完全沒有彈性的車子，任何小車都不比牠更不舒服。我曾經發誓永不再坐這種車子。

那天晚上，我們僱定黃包車到新絳，新絳是汾河彼岸的一個縣城。李運用絕大的鑿別力，選定四個樣子最強壯的車夫；我們也許要他們一直拉到黃河。我們把所有行李堆在一輛車子裏，最後沿着黃泥路出發。

我們穿過一個圍繞着懸崖絕壁的遼闊的山谷。這是一片美麗的鄉野，被深冬的太陽照成黃棕色。我們經過精緻的礮堡，堡牆上蓋滿了反共的口號——牠們是在那年春天紅軍自陝入晉後被建造起來的。我們到了汾河的時候，天色漸漸暗下來了；而在汾河的北岸，新絳的城牆美妙如畫地爬上黃土的懸崖。

汾河已凍成了冰；上一架塔浮橋。一些專給騾夫和小販住宿的廉價的旅店開設在橋邊。但是一個有軍隊駐守的要鎮，如果要我們對該鎮印像好一點，就必須給我們新絳所有的最好寓所。在守城門的衛兵還來不及盤問我們的時候，苗就要求他爲『重要的外國客人』找一個清淨的寓所。守兵彬彬有禮地接過我們的名片。在中國，外國人的名片是一種有無上價值的護照，如果有同道的中國人再替這外國人吹捧一下，這名片就更有價值。守兵的長官親自把我們護送到本鎮最好的旅店。

我們在一間擠滿了兵士，貼滿了日本春藥的廣告的飯館裏吃了一頓非常好的晚餐。我們回到旅店的時候，發覺店內相當清潔，而且真的使人感到愉快，炕內生着火，檯上點着一盞油燈。李把我們的被褥攤在炕上，我那綢裏子的包毯是一種真正的奢侈品。

從房外的院子裏傳來陣陣的談話聲、僕役們的抱怨聲，以及宴飲作樂的回聲，接着一切都靜默了，很使人感到樂意。直到我們隔壁房間裏突然湧起一陣可怕的吵鬧。共有三種聲音，兩種是男人的，一種是女人的，說的是土話，不易聽懂。但那個女人似乎堅持自己的主見。

『他們在吵着誰該同她睡覺，』苗說。『但吵得太大聲了。我要去跟他們說一說。』

這是我第一次發見我的朋友說話的力量。他攀起他的吊褲帶，披上大衣，消失在院子裏了。當我聽見他帶着和氣的旅行態度，低聲向那三個人作簡短演說時，我預料他將被打倒在地球上。但一會兒後，他沉靜地回來了，死一般的靜寂統治着隔壁的房間。我對他的尊敬是大增加了。

大清早，我們就被不知疲倦的李喚醒了。因為僱不到其他更好的車子，他在前一天重又僱定了原來的幾輛黃包車。我們匆匆吃了一些餅乾和麵包片，作爲早餐，付了帳，離開了旅店。

在中國，不管你起身多麼早，總有人比你更早的。當我們走向西門的時候，牛車在狹窄的街道上輾轉作響，挑水扁擔子和諸位呻吟着。牛車滾過爛泥路，留下十八吋深的轍跡。我們穿出城門，到了河邊凍得僵硬的馬路。

天氣是那樣的冷，我們不能坐在黃包車裏了。我們下車步行。李穿着皮鞋（他穿皮鞋僅僅爲着面子）走路，一直感覺到很難堪，結果買了一雙軟軟的中國鞋，跨着大步，我們誰都趕不上他。他真是自得其樂。我們是奇怪的一夥，但在中國的路上，奇怪的人多得很呢。我們總可以冒充傳教師。

道路立刻向上轉到高原的邊沿。在我們的前面，彎曲的河流閃着白光，活像一道冰川。在我們的前面，橫過寬闊的河谷的日子，是一列模糊的山影。「那地方就是陝西，」苗吃力地說。這看來很遠很遠，而我們行進又覺得可憐。

我們在路邊一間旅店裏吃了中飯，這該是一間下等旅店，具有一切傳統的屬性，其中包

含跳蚤我無時無刻不害怕虱子，而苗對此種動物却滿不在乎。這是很可以驚異的，因為我已打過防疫針，而他沒有打過。先後不久，我們又經過另一個古城（西山）的城牆，離禹門口——黃河的渡口，只有一半路了，太陽還高得很，不怕趕不完這段旅程。

但到了晚上，我們還沒有到達黃河。當我們走近河清（我們的路線上最後一個市鎮）的時候，只有一抹蒼白的晚霞在陝西山頂的上空逡巡着。夜裏旅行在中國是很不普遍的，何況這晉陝邊界的近旁而以多匪著稱。我們決定明天渡河。

我們在首先看到的旅店裏喝茶，但這旅店的房間是那樣的慌憐，我的心沉下去了。苗在這裏大顯身手——他一定要守兵的隊長設法一個比較清潔的寓所。年紀青青的隊長被他弄得很窘，他說鎮上沒有更好的旅店。他叫我們去拜訪縣長，就在衙門裏過夜。但這時去作社交上的拜訪，實在太晚了。最後他突然靈機一動，領我們到他一個朋友的房子裏。他這位朋友是一個棉花商人，是鎮上最有錢的老板之一。

不雅觀的店面上的笨重的門扇被推開來了，我們進入中堂，成堆的棉花在灰色牆壁的掩襯下閃着白光，房子的主人不在家，由他姪子很客氣地招待我們。那天晚上，我們睡在一間有雕花的天花板和閃亮的傢俱的房子裏，一張用瓷磚砌成的炕上。甚至熟悉中國各方面生活的苗對我們這個寓所的豪華，也感到驚異。我們感謝主人的招待，但這一家的豪華和我們所經過的鄉村的赤貧的對比，也是一種啓示中國的貧富盡分得那麼清楚，這在世界各國實不多見。

第二天早晨，我們去見知縣和苗的隊長，問他衙門口的黃河渡口的情形。他保證我們渡河不會有什麼困難；河冰走那變態厚，我們可以寫寫意意地走過去。當局也不會有什麼阻

擄。

我當時覺得他正在寬慰我們的心，藉以保全我們對他們的殷勤招待的良好印像，但我們急想出發，我們離黃河不過兩小時的旅程。主人再三拉議我們給僕人們一些小費，但我們反因此多給了他們應得的數目。我們簡直奮到有點發昏的程度，因為渡過黃河，就是韓城，那裏該有一輛汽車在等着我們。我們終於逼近我們的目的地了。

這是清明晴朗的日子，但當我們更加走近黃河的時候，一陣狂風開始湧了起來。像我們後來所知道的一樣，禹門口老是括着狂風的。我們的車夫勇敢地跟狂風角鬥，但最後我們還是下車步行。道路縮得很小了，是一條狹窄的野路。

在我們還沒有看見黃河的時候，我們就在各種自然現象中感覺到牠的存在。黃色的灰塵猛烈地飛揚，蓋在我們的臉上，黏在我們的眼角裏，我們的鼻孔裏。現在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見那隔在兩山之間的河口，離這河口一哩左右的地方，一枝黃色灰塵的巨大的圓柱升入空中。這是從河床裏被風吹來的黃沙，牠在兩山之間疾捲着，好像從煙窗裏發出來似的。

我們走下那高原的最後的平面。這裏的地面是赤裸而且多石，散滿了農田和墳碑。這個沒有生命的地方，彷彿總不是祖先們所鍾愛的安息地。

南面汾河在山谷的那一邊繞過黃土的懸崖，匯入黃河。北面——近得很，也高得很——是山西最後的羣的，在這山脈的盡端，在西岸的山峽的對面，躺着禹門口。

我們繞過凸邊的小山，突然間躲過了一陣暴風，到了一條蓋着盈寸塵灰的狹窄村街，兩旁是黑暗的石造的小屋。那個關口就聳立在我們前面；我們的不自覺地加快自己的脚步。我

們沿着街道走，突然走到一片曠野，圓石子掩埋在黃沙中。在我們的腳下，流着滾滾的黃河，這是一道眩目的激流，水是棕色的，河冰嘶嘶作響。

『到啦！』苗叫喊道，風把話語從他喉嚨吹了開去。『我們到了！』

六 禹廟裏的囚徒

這是一所非常浪漫的地方，有點像巴威的亞耳卑斯山，也有點像阿的治河上游的流域。河的兩岸各有峻峭的岩壁，彼此相對，每座岩壁的頂上都有許多廟宇。每座岩壁都是堡壘。仰望着近在目前的懸崖，我們看見圍牆上邊的鎗刺的閃光。我們是到了『叛省』的邊境了。要在這裏搭小船渡河，顯然是不可能的。水流從峽谷裏瀉出來，有如水鬧的逸水，從結冰的河面的邊際帶來許多大冰塊。有一條鋼纜橫過激流，但這對我們沒有多大用處。因為是冬天，村子裏所有的小船都不能下水了，牠們排列在河岸上，船身一半掩埋在沙土裏。

李從一間鑿腳的小酒店裏走出來，他原是對這酒店裏詢問渡河的方法。唯一渡河的方法，就是走到那隔在兩山之間的結冰的河面，從冰上穿過去。而通到那地方的唯一路線就是一條通懸崖上的廟宇小路。

『看樣子，我們非嘗試一下不可。』苗點頭同意我的話。我們就一塊兒登上海岩崖開鑿成的石級，到了那座廟宇的大門。

這是一座很神氣的廟宇，是用以紀念大禹的建築物。人們猜想在那大祭壇邊下的地窟裏，一定埋藏着大禹用以設計治水的巨大工程的工具。如果後人會依照禹的計劃，繼續濬河（

不要老是增築堤防，)則黃河的水患也許決不會發生。

現在，當我們站在禹廟的大門前的時候，我們看見一條通達黃河的小路。牠跟懸崖上的小路相溝通，由一個兵士把守着。他好奇地注視我們，但似乎沒有什麼惡意。

『你看怎麼樣？』我問苗。『給他五塊錢，他也許肯讓我們通過。』我的朋友考慮了一會兒。

『太險了，』他最後說。『你是外國人，現在正在發生內戰。我們必須獲得官方的通行證。』

由於這一游移，我們竟在禹門口耽擱了三天。

我們知道有一個專司警衛的年輕的排長，很有禮貌地去拜會他。他的態度是無可非議的，但他告訴我們，他接到嚴厲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渡河。他說從陝西方面渡河過來的人，一都被捕了。他領我們去看一羣不幸的人兒，兩手反縛着，被繫閉在一個內院裏，由士兵看守着。當我們說明我們公事的緊要，說明我們自己的身份的時候，他很有禮貌地聳一聳肩膀，請我們吃飯。他是那樣誠懇，我們始終不敢以錢相賄。機會就這樣被錯過了。我請他打電話去請示他在河津的上官。他照辦了，但結果很不圓滿，他說我們必須請示河津的縣長。甚至苗對這都有點垂頭喪氣，但他始終勇敢地打電話給縣長。縣長當然是赴宴會去了。當我們在幾小時後終於打通電話的時候，縣長先向我們道一番，於是說他必須去電請示太原的上峯。一天左右能得到回音。他說禹門口是一所多風的斃腳地方，如果我們住在這裏不適意，他歡迎我們到河津去住在他們衙門裏。

『完了！』當肯告訴我交涉了結果時，我這幾聲非着，『事情一經公開，我們就不能賄賂任何人了，除非去賄賂門錫山。你看怎麼辦？——你住在這裏很危險吧？』

『比河津安全些，』他回答。『我想我們還是住在這裏，另找門路。』他先向縣長恭維了一陣，於是婉謝了他的好意的邀請。他說外國人都是很固執的，而這一個連二十里回頭路都不願意走。如果縣長能拍個急電到太原去，那他就感激不盡了。

那一天其餘的時間，我們一直在察音着馮潮，跟士兵們交朋友。我們立刻發覺大家都很喜欢一個名叫小虎的孩子，這孩子的父親是偵緝隊長，是馮門口的高級長官。我們決定去結織小虎及其家族。我們知道這是像玩火一樣的危险，但同時似乎也是我們一個絕好機會。

王偵緝隊長是一個很快活的大塊頭，偵探們大都是這樣的。他的職務是偵緝偷運雅片的脚色，搜捕共產黨員。前一部份職務對於他大概比後一部份職務更有利可圖。無論如何，他似乎很習慣於荒野中的生活（那個排長就不同了，他老在抱怨這裏生指的枯燥。）王隊長顯然是我們的人。

小虎是他心愛的至寶。我們稱贊小虎的圓胖的四肢，稱贊他的體力和智慧，說他很像他的父親。我教他說“Tito”（哈囉）和“Good-bye”（再會），我希望在我們留在馮門口時期內，這兩句用語是够他用了。王隊長不久就請我們住到他的家裏去（他佔有禹廟的一邊外房），一直住到我們離開馮門口的時候。有一樣事情，我們是決定了的——我們決不走回頭路。第二天天氣比往常更冷，風比往常刮得更大。我們在下邊村子裏同李開了一個秘密會議，討論怎樣利用機會，偷偷爬過小山，怎樣找到一個可以渡河的地點。但如果不沿那條被嚴

密把守着的小路走，那麼要去到那結冰的河面，必須走好幾哩路，而且其中有一部份路程，走起來實在非常吃力。我們又咒咒我們的行李。

到了中午，回到廟裏的時候，我們發覺面向黃河方面的小路的門是通行無阻了。守兵們正在換班。這時候我們準備不顧死活地來一下。我提議索性在他們正面衝突。苗點頭同意，我們就悄悄地收集好我們的行李，竭力裝出若無其事的神色，穿過這堵門。

我們沿着小路走了五十碼左右的時候，我們上邊的一個哨兵就向我們發出警告的喊聲。我們帶着十分冷淡的神情，繼續走我們的路。一陣混雜的喊聲湧起來了；我們立刻發覺自己已被一羣昂奮的士兵包圍住了，他們企圖用鎗桿逼使我們回頭。『要是這一次不走，就永遠走不成了。』我對苗耳語道。他點點頭。我們帶着堅定的愚蠢的微笑，繼續前進。

我們的朋友（那個排長）沿着小路急追下來。對於他所有的抗議，我們僅僅回答他一句話。這是一個瘋狂的外國人，他一定要渡河，即使游水過去，亦所不顧。他們在這危急關頭一定要勸阻他。外國人都有一種奇異的衝動，還有許多不便侵犯的特權。何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外國人。

這是一幕離奇的場面——一羣人在黃河上邊狹窄的山路上指手劃腳，河身在我們下邊轉了一個大灣，黑色的水面滲雜着白色的條紋。這一次雙方的對談，是我生平所參加的最冷淡無味的談話。我想：我們大多數人都揮舞着臂膀，這與其說是因為要加強語勢，不如說是要保持各自的體溫。我當然大大越出了自己應享的權利，但那位青年軍官却不知道這一點。他所知道的就是一件事：如果我們跑開了，他是要負責任的。

士兵們抓住我們的行李。我把自己的行李搶了回來，但苗却不能這樣幹。兵士們正抓住他的兩臂，甚至開始拉他回去。『你一個人去吧，』他對我說。但我不能這樣丟棄了他。排長流淚了——這一半當然是由於情緒的激動，一半也由於寒的風吹襲。必須想出一個辦法來。

我們提出一個最後要求：如果現在要我們回去，排長必須保證我們明天中午能够渡河。這完全是一個種要挾，但我們總希望自己的努力獲得一點確實的代價。他勉強接受了我們的要求。我們於是離開了這寒風撲面的場所，走回禹廟去，大家都很满意。

我們真的獲得了什麼嗎？一小時後，我看見面河的門被封鎖了，阻塞着許多沉重的木頭。李垂頭喪氣地告訴我們：守兵們已得到命令，如果我們再走，那不管外國人不外國人，他們都得閉鎗。我們成爲肥胖的偵緝隊長家裏的囚徒了。

那個排長不見了。

聖誕節的前夜。我們好幾天沒有聽到西安的消息了。我們被幽禁在一個古廟裡，屋頂在狂風的襲擊下不斷地呻吟着，岩石錯落的牆基被十分可惡的激流——使我們不能達到目的地的激流衝擊着。直接行動既然失敗了，除了再向官方交涉外，沒有別的辦法。苗把那天下午的大部時光都花在打電話上。我退隱在牀上（這兒還有一點燠氣。）竭力以莎氏比亞的 *Sonnet* 安慰自己，這是我手邊僅有的書本。這時的處境使我想起劇中的情節：我覺得自己很像被禁閉在圍繞着岩崖的城堡裏的亦梭爾脫。對着洶湧的風浪的低訴，我聽出自己無常的命運的回聲。

如果沒有別的東西來打擾我們的幽禁生活，我立誓要從莎氏比亞的 *Sonnets* 裏發見一種新的理論。對於住在寺院裏的人，這是一種很適當的工作。

我意思不到的助手是來請我幫忙。偵緝隊長開着同情我們。我給小虎攝了一張照片，而且讓他任意玩弄我的打字機，這到底不是毫無代價的。偵緝隊長打電話給他在河津的朋友們，回頭告訴我們，說其中有兩個朋友當天傍晚都要來看我們——一個是縣長的秘書，一個是駐軍的長官（他的確要負責任的，因為他當時並未警告我們不能渡河。）

五點鐘左右，縣長的秘書騎腳踏車到了由於寒冷，他真能頗為沉鬱。過一會兒，那位軍官也騎馬到了。王偵緝隊長設宴招待我們全體。當那那個排長也出現了，他對於早晨的「失禮」，「速速向我們道歉。大家所有的差別都統一在米酒和烟草的濃霧裏了。」

偵緝隊長是個有名的酒徒。同時又是我們的主人。在這種場合，似乎有說情的可能。我跟苗交換了一番簡短的談話，幸虧他們都不懂英語。）

「這是你向他們說情的機會，」我提示道。「如果你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喝酒的事情儘可讓我來應酬。」他點頭表示同意。

這是一種荷馬式的宴會。白乾是中國酒類最強烈的一種。他跟杜松子酒或「伏特卡」差不多，聽說是用高粱和其他東西釀成的，不過此說尙難證實。牠是燙熱，一滿杯一滿杯地喝，酒性是可怕的。

中國人喝酒很有禮貌。他們有好幾種罰酒的競技，老是輸的人喝酒。酒杯是小的；但說不定接連罰了許多次。這些競技中最普通的一種就是猜拳。一人猜中了的時候，喊聲大作，

一聲高似一聲。但得勝者也往往同情對手，喝了一杯；這樣既够朋友，又可以潤潤自己的喉嚨。

我們對於猜拳是個門外漢，但依舊可以喝酒。當喝酒真正開始的時候，大家就不自覺地顯露出各自的真面目。偵緝隊長是個儉樸的人，他說自己的酒量只能喝三斤，其實喝三瓶也可以。排長的酒量僅次於隊長（禹門口的生活是那樣單調，他就成爲酒徒的訓練場；）河津來的軍官的酒量也跟排長差不多。縣長的祕書是富於書生氣的人物，不大會喝酒，但結果也有些醉了。苗說自己的胃不大好，只有他一個人沒有喝醉。

我記得那天晚上情景：我們的主人斟滿我的酒杯時的那副容光煥發的大臉孔；排長的聚精會神的苦臉，他拚命要勝過他的上官；還有那縣長的祕書（他是真正的主要人物）臉上的憂鬱的表情，當他躺在炕上，悲哀地凝視着天花板，疑惑着自己爲什麼來這裏的時候。苗不時拉了他們中的一個到房間的另一端低聲談話。我的眼睛早已失却了鋒芒，但依舊可以看見他那動人的姿勢。我們主人的酒量是不能滿足的，他不斷地喊酒來，直到僕人們都開始露出驚訝的神色。

我們在半夜前散了夥，我已經喝得太多了。兩個近護兵護送我們英勇的軍官到了牀上。排長摘下帽子，行了一個告別的敬禮。

當他們全體都離開了的時候，苗愉快地走到我的跟前。『我們明天早晨離開這裏。一切都安排好了。』

『好極，』我說。『請用冷水澆醒我。』

第二天早晨，我發覺這是聖誕節的時候，心裏殊為激動，我們沒有耽誤了一點時間。用凍得麻木了的手指和還是昏沉沉的頭腦，我在打字機上打了一封給團錫山將軍的動人的信。在信裏，我說明我們違反當地官憲的勸告，自動冒險渡河。這是由於我們的執拗，絕不能責備他們。我把這信再打一份給禹門口鎮守隊長，另份寄給河津的縣長。苗又寫了幾封類似的中文信，我們鄭重地簽了名。王偵緝隊長給我們一張特別通行證，要求黃河彼岸的官憲給我們各方面的幫助。我們不知道怎樣報答他的好意才好。苗最後以十塊錢的代價（約比原價貴九倍）買了一副黃邊眼鏡。他說用牠遮蔽灰塵，實際上是用以遮掩他的面目，使別人不易認識他。

我們對禹廟作莊嚴的告別，牠那着色的瓦片在慘白的陽光中燦爛地閃耀着。幾株大樹在狂風中呻吟着。經過禹廟裏這場奇異的插戲之後，我們簡直不相信自己還能繼續前進。苗認為我們所以能順利地離開禹廟，應該歸功於他自己高妙的外交手腕，而我則認為應該感謝小虎和白乾。後來我們又知道還有比這一切更有力量的經濟的因素。

小虎最後一次對我們說 Good-bye，他的圓圓的小臉孔對着我們給他的一堆銅板出神。我們的主人們偵緝隊長和排長——和氣地送我們走下山路，這就是我們昨天爭鬧的場所。他們給我們挑行李的挑夫，而且派一名兵引導我們穿過河冰。我們在懸崖脚下分了手，大家都帶着友愛的表情，這種表情大概不是完全不真實的。

小路開始出現了由岩石開鑿成的石級，在懸崖的轉角，風像一種堅硬的東西一樣打擊我們。我們緊緊傍着崖面，下到河冰的邊沿，我們的嚮導對我們指明到冰面去的路，這裏因為

是下風，蓋着好幾吋厚的灰塵和雪粉。再對我們指明正確的方向之後，就慌忙回去了。

過這條河並不是怎樣容易的事。河冰的平面，正如玻璃一樣光滑。我的生氣虎虎地滑溜過牠。我的靴底是釘着釘子的在這樣的平面上走，很不適宜。我竭力站住，攝了兩張照片，風幾乎把照相機從我手裏吹了開去。我記得穿西伯利亞的列車曾在克刺斯諾斯克停了五分鐘，那時的寒暑表是零度下六十度，那裏的風也跟這裏的風相彷彿，但那時人們可以鑽回溫暖的車室裏去。

我們溜到半河的時候，最最強烈的水流在我們腳下衝向河岸。這裏河冰爆裂成許多大冰塊，交相堆疊着，有如瓦礫堆。有些大冰塊的邊沿出現着不祥的縫隙。這裏離大冰原的邊沿只有幾百碼遠，每一分鐘總有一大片浮冰帶着猛烈的吼聲離開了冰原，不一會兒，突然出現在遠遠的下流。我怪不舒服地意識到一定大量的水在衝過我們的腳下，意識到這兩山之間急水一定奔流得很快。

此刻做我們嚮導的是李，我們跟着他走，往前側着身子，抵禦狂風，風把灰塵和雪吹到我們的臉上。但到了河的彼岸，我們迷了路，橫在我們面前的是峻峭的岩崖。我們剛才筆直地穿過河面的，沒有偏向着上流傾斜地穿過去的。我們誰都不大願意走回頭路。

我們看見高處的山腰出現着一條小路。要到達那條小路，除了往上爬外，沒有別的法子。

李是那齣插戲的主角。他找出一條登上懸崖的路線，而且把我們比較大一點的行李拖了上去，苗不是體育專家，但在岩石上爬行恰像小貓一樣敏捷。當我們到達了那條小路，俯眺

下邊可怕的深淵時，我們覺得應該慶祝自己。我們終於到陝西了。

雖然寒風凜烈，但我們渾身都濕透了汗水。李俊在鋪蓋卷上，用一塊紅色的手巾揩拭着他那長長的臉龐。他於是走了過來，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

『他們所以讓你們走，』他愉快地說，『因為他們的損失太大了。』
『怎麼？』我以為他一定指我們的贍宿費。這總不會是一筆很大的數目。

『在你們未來以前，許多人都滑過河了。他們給守兵四塊錢。但當你們打電話給縣長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把門關起來，不准任何人通過。在那三天內，總有多人折回去了』

我一看苗。他們損失了一千多元！他們當然要讓我們走。我的『面子』和苗的外交手腕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倒由經濟的壓力來完成了。我們在開頭的確錯過了機會。

我們帶着真正的快感，沿着山路跨着大步，走下懸崖，一直走到西門口，這裏的廟宇正和我們曾在裏邊做過囚徒的磚牆相對。當我們俯瞰下邊的屋頂時，我們聽到一陣引擎的響聲——一架飛機沿着低空飛過我們後邊的小山，飛向太原。我們能夠看見機翼上銀灰色的國民黨徽。這大概是從西安飛來的。

到了廟裏，我們拿出王偵緝隊長的通行證，要求對方替我們僱幾匹騾子或驢子。人們看見我們，驚駭萬狀——李俊來告訴我們，他們一致斷定我們是從飛機裏下來的，因為很久以來，沒有一個人渡河過來。但他們終於指引我們到了最近的村莊，在這村莊裏我們可以僱到驢子。

我們向禹門口以守兵作最後的告別——在那最高的雉堞上，出現着一個極小的形體，我

斷定這是小虎。我們沿着渾是泥沙的河岸走了幾哩路。在小路下邊，河身變闊了，闊度至少有半哩。在這裏，在黃土的山崖的掩蔽下，氣候幾乎是暖和平的。除了少數幾條狹窄的支流外，河水完全凍成了薄冰。

我們在河濱的一個蹩脚的小村莊裏僱到四匹驢子載我們到韓城，韓城是黃河南二十哩左右的一個縣城，首要跟那裏的朋友們聯絡。我們決定在一天內結束這一段旅程。

我們所有的行李都載在驢子上。當我正在考慮着應否再在我的畜牲的背上加上十二頭即一頭等於十四磅的物件的時候，李突然發出一聲絕望的呼號。我從沒有看見他發洩過如此強烈的情緒。他似乎在剛才爬山的時候失掉了八隻大洋，決意回去找尋。我們勸他不要這樣，我們要緊的是儘快地趕到韓城去，但我們却無法安慰他的痛苦。那一天，在我們歇路的時候，他就用一種生動的啞劇說明他舉起一隻膝頭爬上一步的當兒，他的錢怎樣從衣袋裏滑了出來。這個私人的悲劇比任何冒險都給他更大的打擊。這恐怕是他生平第一次失掉錢。

這是我生平所過的聖誕日中最緊張的聖誕日，就是下午玩着 Hokey 球，晚上玩着室內遊戲的英國聖誕日，也不能跟牠相比。這一段路應該是很容易走的，因為我們又到了平原了。但這黃土的地面高低不平，我們必須不斷地上坡下坡。灰塵在我們週圍疾捲，直到我們都變成了跟我們的驢子一樣的灰黃。大部份路程我都是步行的，因為我絕對不願意騎着一匹只及我自己及我自己編籃三分之一大的畜牲。我這種奄奄的習性給與驢夫們無限的樂趣。

這是浴在溫柔的陽光中的美麗的鄉野，古塔和廟宇的屋頂聳立棕色田野上。大部份路

程我們都沿着黃河走的：我們對於這富有沉靜的平原味的黃河發生了一種感情。全部風景很像意大利，像華北許多地方一樣。赤裸的小山的色彩是怪異醜陋的。

我們踏進一個小村莊的時候，聽見喇叭的聲音，一隊士兵正從村子裏開出來。他們是開禹門口去的。苗說他們是馮欽哉的部隊；但我們不敢停步詢問他們。我們到韓城會知道一切情形的。

那天晚上，天空掛着一輪滿月，月光救了我們。當我們翻過一座小山的山崗，俯瞰酣睡着的城市的時候，已近九點鐘了。當我們走近城門的黑影時，守兵嚴厲地喝住我們。每天到了這時時間，沒有一個好人還在城外。我們太疲倦了，簡直無力答話。

我們找到一所旅店，牠跟普通的旅店一樣。我們蹲在炕上，吃着麵和麥餅，作爲聖誕節的正餐。這個聖誕節在中國很有歷史的意義，雖然那時我們還看不出這一點。『明天我們會找到車子，』苗愉快的說。睡眠像波浪一樣吞沒了我們。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我還能聽見黃河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我們一早就起身去拜訪縣長。我們捉摸不定這位縣長的態度，因爲我們沒有聽到關於馮欽哉的消息，不知道這個防區是傾向於西安呢，還是傾向於南京。縣長衙門充滿了沉沉的暮氣，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新生活運動的標語。『我對這地方沒有好感，』我低語道，當我們等待着這位大人物的時候。但苗是比較樂觀的。

縣長終於出現了。他是我們圓滑的官員，但很摩登，做事很認真的樣子。會見必須遵照一定的規矩：苗不得不拿出最後一張印着趙姓的名片。縣長向我們問了許多話。爲什麼我們

急要到西安去？

我說自己是新聞記者，而且有事與張學良和蔣委員長接洽。

『那麼爲什麼到西安去？』縣長溫和地問。他兩眼盯着我，於是又盯着苗。『你們到西安找不到他們。』

我們顯然很窘，而我又不喜歡他的態度。『爲什麼？』我順口問了這麼一句。

『你們不知道？但我們這個消息也不過是從昨夜南京的廣播聽來的。昨天張學良同蔣介石將軍一塊兒從西安飛往洛陽。蔣委員長今天可以回到首都。』

他注視着這一消息在我們身上所引起的反響。苗的臉色有點慘白了；我不相信這個消息？蔣竟能恢復自由，而且這樣快，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們依舊要到西安去，』我固執地說。韓城有一輛汽車或卡車嗎？

縣長連連道歉。幾星期來，韓城一直沒有汽車。關於這一點，他說得非常肯定。他的兩眼依舊好奇地盯着苗。苗黑眼鏡背後神靈閃閃着眼。

我們帶着反常的急促離開衙門。『這消息靠得住嗎？』我問我的朋友。『這是南京的廣播。而且張司令老說如果委員長恢復了自由，他要送他回去。』他重重地歎一聲氣。『但我們必須立刻離開韓城。我不喜歡那個縣長。』

我亦有同感。

七 武裝的城市

我們垂頭喪氣地回到旅店。這是我們出發以來最嚴重的挫折：我們的旅行似乎完全白費心力。

在那個多事的聖誕日，西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如果蔣介石將軍真的恢復了自由，則東北的運動似乎已經流產了。蔣將軍之被禁會理由爲他們最劇烈的政治爭點；現在拋棄了這個有利條件，他們一定對自己實力有充分的自信，否則就是全然絕望。苗完全不知所措了。而我們自己的處境也很不好。我們離西安還有三百多哩，正落在馮欽哉的防區裏。這位雄心勃勃的軍閥的曖昧態度，不久終將判明；如果這消息靠得住，他一定要公然擁護南京政府了。這樣，我的朋友被發覺的危險比任何時候都更大。

我們本來期望有一個車子來接我們——但據縣長所說，韓城並沒有車子。苗決定冒險拍一個電報給西安的朋友，請他們派一輛車子到郃陽。同時我們必須趕快前進，韓城在一小時前似乎是一所避難的天堂，而此刻却開始顯出不妙的情形了。

我們又不得不僱黃包車了。我們在城裏尋找着，結果僱得三輛，他們願意把我們拉到郃陽。但當我們離開旅店的院子時，一輛車子往後翻倒了，幾乎把倒羣的老李嚇昏了。這車夫彷彿是個生手，沒有一點拉車經驗，就勉強投入這項行業。李發誓決不再坐這個生手的車子，使自己的頸項遭擾（你從黃包車上跌下來有時是帶危險的），我們就讓僱一雙驢子來，繼續趕路。這裏離西安還有三百哩，我們平均每小時走五哩左右。

我們穿過一道古石的石橋，開始爬上黃土山。在高高的山坡上，我們經過一座堂皇的廟宇。這是一片迷人的鄉野，如果我們有時間去欣賞牠的話。我們在高原的頂上等待放着我們

的行李的黃包車。我們從這裏可以望見白色的黃河跟遠山相映襯。棕色的田野暗示着不久將出現新綠，因為早發的草類和第一季的穀物正從泥土中透露上來。這高地上剛下過雪，空氣是怪新鮮的。

車夫們流着汗，爬上山坡，他們黃銅色的臉孔放着光。他們把車子配在老李的驢子上，驢子除拉車外；還要載負老李和被褥。這驢子是有耐性的動物，牠似乎受慣了比這更不好的待遇。這時我們聽到引擎的聲音。

『飛機，』李說，一邊巡視着天空。『沒有飛機的影子！』我喊道。『這是一輛上山來的車子。』

我們這時剛剛停足在山頂上，車子在這裏必須慢慢地行駛。這是真正使人興奮的一剎那，因為『到西安還有三百哩路』這個思想緊緊黏住我們的腦袋。這輛車子會對我們表示好意嗎？牠會停下來嗎？

一會兒後，我們看見一輛急衝上山的小山的軍用卡車的前部。在車夫坐位的後邊是灰綠色的軍服和來福槍的槍筒。這輛車子至少是保衛得很週密的。我向苗投了苦惱的詢問的一瞥，他正在注望着這輛卡車。我們不得不冒一冒險，不管這險多麼大。

我們站在道路的中央向車夫打招呼。最初牠似乎不願停車，而我們必須跳到路邊去。接着，制動機『軋』的一聲響，從車夫的坐位裏突然送出打招呼的喊聲。一個穿軍服的青年，原來是坐在車夫旁邊的，這時跳下車來，怪熱熱地握着苗的手。我們終於交運了。我們找到了我們的朋友。

這位青年軍官是楊虎城派到馮欽哉那裏去的特使，馮氏的曖昧態度一直使我們那樣懸慮不安。這軍官在執行着最後的任務，力圖救拯動搖不定的馮氏。但直到此刻，他似乎還沒有獲得怎樣的成功。

馮曾經拒絕接見他，要他解釋爲什麼一個親善的使節要坐軍用卡車，要帶武裝衛隊。這件事很可以說明馮氏傾向於哪一邊。這位特使，同時也曾受命探尋我們的蹤跡，於昨天到達韓城。那天晚上，韓城的縣長（我們在幾個鐘頭前見過他）企圖把全體人員拘禁起來。而這位特使是一個非常堅定的青年人，他就憑他手下的那些槍桿，逃了出來。

「蔣介石被開釋的消息靠得住嗎？」首先提出這個火急的問題。

「我們在兩天前提離開西安。但這消息恐怕是靠不住的。」

我們曾經由於本能的作用而急急離開了韓城。這件事做得正對。此刻這輛卡車正向郃陽進發，郃陽的縣長是「中立」的脚色。此種複雜的從屬關係，真使人大惑不解。馮欽哉顯然還沒有跟楊虎城公然翻臉，雖然他被擢升爲一等司令官。像絕大多數的中國軍閥一樣，他要盡可能地獲得雙方的實惠。但楊虎城對他的拉攏，也未嘗放鬆過。

這一番聽來如此複雜的解釋，不過費去特使一忽兒的時間。李已經付清了黃包車錢，把我們的行李丟到卡車裏。我們也爬上車去。一會兒後，我們的卡車就往前疾馳。

不管這個國度的局面如何混亂，我們終於到這一班人，獲得了更合理的交通工具，這實在是一種大大的忻慰。過去一百五十哩路，費去了我們五天工夫，現在我們却以每小時四十哩的速率，掃過黃土的高原。一種微妙的新力量似乎從這輛堅固的美國式卡車的六個汽筒

裏噴射出來。卡車上的衛隊——從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選拔出來的茁壯的陝西人——擎着實彈的來福槍。我們覺得，如果必要的話，我們儘可跟對方一直打到西安。

我們的車子到了邵陽，開入衙門的院子裏時，天色漸漸暗下來了。縣長生病（大概是一種外交病，）但他的屬員們却熱烈地歡迎我們。我們受到很好的款待。

但到了半夜，當苗和我同睡在一張木炕上的時候，李溜進房來，報告一個驚人的故事。他說那輛卡車已被扣留起來；到破曉時，他們全體將遭逮捕。往常李是不大會激動情感的，但此刻顯然露出了苦惱。這也許不過是僕人們的閒談，也許是靠得住的。

我們對這件事也無法可想。我們回到炕上去睡，沒有脫下靴子。

當第一道灰色曙光透進紙窗的時候，一個兵士走進我們的房裏，遞給苗一張公文。我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聽見急促的低微的語音。苗一手輕輕拉着我的肩膀。

『我們必須立刻離開這裏。馮欽哉在大荔。我們馬上到那裏去看他。』

這並不是很穩當的事情。我這樣一邊告訴自己，一邊喝下一盃稀飯，換上另一件汗衫。這件事看來是很可疑的。

天氣冷得可怕，我們驅車在雪堆中間穿過晨霧。道路圍繞着深谷的邊緣，忽高忽低。我斷定我們的車夫不是一個天才，就是一個瘋子，或者既是天才，又是瘋子。大多數中國車夫開車的本領都很高妙，他們毫不介意似的把着舵輪，這是日本車夫所不能及的。但他所憑藉的還是機器，萬一制動機出了毛病，我真不知道會引起怎樣的後果。幸虧制動機並沒有出毛病。

我們跟車內的兵士們一同抽着紙烟。其中有兩個是小軍官——一個是曾在馮玉祥部下服務過的老腳色，馮氏是中國政府的一個神秘人物，確是一個天生的領袖，他練軍的效能，只有中國紅軍堪與比擬。這位小隊長有一張棕色的臉，起皺得像一個胡桃，蔓生着鬍子和髭鬚，他很以牠們自傲。他兩耳套着小小的皮裏子的耳帽，形狀像一個心，繡着出自農民心裁的花紋。那位班長是一個典型的陝西青年，臉紅恰如一輪滿月，他站在卡車的邊沿，對着趕牛的牧童們或路上的流丐大聲疾呼着。我們的車子激起陣陣的灰塵，嚇壞了路上的牛畜。

我們在中午以前到達馮欽哉的都城。這是一個圍着堅厚城牆的鞏固的小城，警衛非常森嚴。雉堞上邊是一羣一羣灰色的兵士和機關槍的黑色槍筒。我們車子沿着城牆附近凹陷的道路行駛，停在離西門幾百碼的地方。馮沒有叫車子開進城裏去。

這位特使進城去了，週身簇擁着馮的武裝衛隊。中國的軍閥都有多疑的天性。我們的隊伍留在城外看守卡車。苗和我躲在一間賣花生糖菓的店子裏，喝着粗劣的茶，狼吞虎嚥地吃着麥糕。

這樣過了兩個鐘頭。兵士們沉靜地玩着賭戲。苗和我不安地踱來踱去，沉浸在愁鬱的思慮裏。

『你想發生了什麼事？』我終於問道。他聳一聳肩，動着兩手，做出一種表意的姿勢。『或者他見到了馮，馮請他吃飯，或者他做扣留了。』我認爲後一種較爲可靠。

大荔至少接觸到了文明的邊緣，驢脚卡車在城外則鋪道上搖擺着。其中有一輛是郵車，

兩個穿綠制服的郵差坐在車內的郵袋上。當突然呼喊一個郵差的名字，這使我吃了一驚。苗交遊之廣，實在驚人；我有時感覺到彷彿東北任何人，他都認識的。

『我們必須搭這郵車前進，』他提議道。『這是可以想辦法的。』

我疑惑地望着被棄的卡車，一邊想着這奇跡似的郵車，陝西鄉下的郵件就是用這種車子傳遞的。但正在這時，那個小隊長發出一聲粗厲的喊聲：『來啦！』他們回來了。

我們的特使從城門現了出來，馮欽哉部下的半連士兵很客氣地護送着他。他和他們分別，顯然雙方都很客氣；不過中國人的禮貌有時是非常虛偽的。我們立刻重新爬進我們的卡車。

『老馮是個壞蛋，』我們的特使跟我們一塊兒坐在卡車裏時，這樣簡單地說。『但我沒有到渭南去的通行證，我們只能走直路。』這倒是一點困難，如果沒有這困難，我們儘可兜一個圈子兜到西安，不要通過老馮的防區。我們好容易找到了車夫，他一直在一間旅店裏喝酒。他憤憤地開動引擎，開着快車，顯然因離開大荔而感到快感。過後我們發覺我們居然通過這一帶難關，真是大大的幸運。再遲一天也許就不成功了。

這天下午，我們一直在陝西的田野間穿着，只在加油的時候停一會兒車。我們樂於這樣趕路，因為只有到叛省的省會，才能瞭解此次事變的真意義。我們希望在入夜前趕到西安。

這是一片寒酸的鄉野。田地是赤裸的，開裂的土地凍得僵硬了。只有坟墓彷彿很多；牠們大都是用磚瓦構成的精緻建築物。比活人的住宅更為堅固。我們駛近一個村莊的堅厚的圍牆，我們推想村莊裏有半數房屋倒塌了，也許有人居住的房屋不過全數四分之一。路邊的農

夫們帶着冷淡的神情注視着我們的軍用卡車，因為到處都是武裝的兵士。空氣中盪漾着戰爭的氛圍，戰爭的恐怖籠罩在這些不毛的田地上。

每到一個城鎮，我們總被守兵喝住；但我們小隊長一邊揮舞着通行證，一邊叫喊着，我們總是疾馳而過，並不停車。雪蓋得更厚了，我們搭小船冒險渡河，小船衝開了浮冰。當我們到達渭水（來自西面的陝西，在潼關跟黃河相會合）的河岸時，天色漸漸暗下來了。

我們馳過路上被炸彈炸成的窟窿，馳到渭水的河濱。前星期曾有南京飛機偵探這裏的渡口。我們在這裏碰到幾輛滿載士兵的卡車，他們向北疾駛——除非去打馮欽哉，我想不出牠們北開的理由。我們坐在一隻平底船裏渡過渭水，大家合力把卡車推上溼滑的河岸。我們此刻是在戰區裏了，因為渭南有大隊東北軍駐守着，渭南成爲內戰的前線了。

在彎曲的大街上，每個門口都塞滿了穿藍灰色軍服的兵士。東北軍戴着灰色的皮帽，看來很像野蠻人；但他們身材很高，體格很壯健。滿洲軍隊中許多兵士都是來自山東的移民，而山東人是以體格強壯出名的。山東出產了一些中國最優秀的軍人。苗回到自己同鄉的隊伍中，感動得像一個小孩子。

我們現在沿疏海路疾馳着，離西安不過八十黑路。南面是一列露台式的小山，前面展開着廣闊的渭水流域。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在冬天的傍晚中顯得那麼和平。但在這曾經成爲戰場的地域，和平到底能保持多久呢？

小山上出現了軍隊，而在大路上，我們又馳過騎兵的行列。這些戰馬都是長毛的蒙古馬，是成吉思汗時代的戰馬的嫡系子孫。牠們是矮小精悍的畜牲，有絕大的堅忍力和驚人的速

力。我想：對於冬天的戰役，牠們比較日軍常在北平斜坡上演習的外國產的戰馬是要適用得多。

「你熟悉這個地方嗎？」我問我的朋友。他微笑着。「很熟悉，當我在「雙十節」前離開西安的時候，我是從這裏逃走的。我們立刻就來到臨潼了，要看見溫泉了，蔣介石將軍在被扣前就住在那裏。」他一邊這麼說着，一邊重重歎着氣。在他看來，委員長既然恢復了自由，「雙十節」的慶祝更要予各個人以無限的欣喜了。

當我們望見雄偉的山脈底下一個小坡的圍牆時，大圓盤似的太陽正從遠山背後落下去。這個小城就是臨潼。這小城的對面，在驪山的山坡上，在赤裸的棲息着烏鴉的樹叢中，擠集着許多廟宇的屋頂。這是有名的遊息地華清觀，唐末楊貴妃跟龜的情侶即作樂於此。

這裏離西安還有十二哩路，一直都很順利地替我們工作着的引擎，此刻却露出吃力的樣子來了。天黑了；車燈沿着模糊的大路劃出一片亮光。在鐵路那邊的堤岸上，我們可以看見一些被棄的卡車的側影。在前面，河流閃着慘白的光。

「這是壩橋！」中國最有名的橋，「當我們的車子困難地駛過兩道矮欄杆中間的不平的理石板時，苗這麼說。他是一個學者，他知道歷史上或文學史上每一個名字，他使這渭水流域充滿了過去時代的回聲。三千年前，長安是中國第二個大朝代的首都紀元前二百五十年，曾有一次偉大的農民革命掃過這流域，掃過我們所經過的一帶鄉野。這裏是發生事變的適當的背景。

我們大家都很緊張，都期待着發生什麼事情。夜空中盪漾着或種奇異而擾人的氛圍。我

們經過一個村莊的圍牆——看不見一點燈光。當我們的車子爬上兩道黃土堤中間一片峻削的斜坡時，有人對我們發出零厲的吆喝；我們的形跡逼着威脅的來禍於阻住我們的前路。卡車上亮起一道光；有誰說出暗號。我們的車子緩慢地往前開着。

苗突然抓住我的臂膀。「你看見那些燈光？那些燈光後面就是西安的城牆。」

一間工廠正在做夜班，所有的窗口都亮着燈光。在前面，在慘淡的屋底底下，橫着一大堆黑影。當我們注望着的時候，一道探照燈光掃過堆垛，照出龐大的牆垛，穿着帆布炮衣的大炮直指天空。西安是一座武裝的城市。

我們通過城外的門，在警衛所跟前停了片刻，繳出我們所有的證明文件。跟着門門的軋軋聲和沉重鐵門的鏗鏘聲，一扇城門打開來了，我們的卡車慢慢地穿過城牆，引擎吃力地工作着。這是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下午近八點鐘的時候。我們到西安的旅行共費了十一天工夫。

「我們先到一個有錢朋友家裏坐一會！」苗曾經這樣說過。「於是你再住到西京招待所去——蔣介石將軍的隨員們時常住在那裏的。設備很摩登——你可以洗熱水澡。」

他有一些有錢的朋友；我並不奇怪，然而我真料不到十分鐘後我們所找到的房子是那樣富麗。僕人們端來白開水和香茶。兩個可愛的小孩從後房衝進我們的房子裏來，一邊「叔叔、叔叔」地喊着，顯然很高興。這是我朋友生活的新的一面。我以前從沒有看到過。他天性是熱情的，我猜想他甚至在那些跟他思想完全不同的人們中，也會結交一些朋友的。

我瞧着他穿着那套熟悉的黑色衣服（我們艱苦的旅行使他這套衣服損壞了，）跟孩子們

玩耍。房內盪漾着溫暖舒適的氛圍，牆壁上掛着出色的字畫，一切都顯出豪富的特徵：他似乎非常習慣於此種氛圍。但我知道他對此類這欣賞着的東西，過一會兒對他就會失掉了意義。他曾冒過險，曾經爲着某種理由準備把這些東西全部充公。此種理由，他恐怕不能用字句表達出來，尤其不能用「中國」兩個字眼來表達。他大概只在氣質上是個革命家，但像列寧所瞭解的或像苦鬥了半輩子的中國軍閥補闕所瞭解的「中國」兩個字的意義，他是不大理會的。

我有一次問他：「你爲什麼要幹這種事？你爲什麼要參加這種運動？」回答是神經質的迷人的微笑，他開始說道：「……我的家在鄂東北松花江上。」我知道他的家是怎麼的家——是一個小村莊裏的農家；我知道他的叔叔和兩個兄弟同着滿洲義勇軍一塊兒戰死了。恐怕這就是他的回答，此外還有他那夢幻般的棕色大眼睛裏的狂熱的閃光。朋友們都叫他「苗瘋子」。

他離開房間打電話到總部去。他回來時對我說：「我的朋友們立刻就來這裏。你可以看見！」——他這時有一種光輝的表情——「造成西安事變的三個腳色。」

我不完全相信他所說的話，但像後來所發覺的一樣，他的話語並不怎樣誇張。

我們正在吸着香茶，享受着火爐的溫暖時，門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一個青年軍官走進房來。他身材不高，但很結實。他穿着皮大衣，彷彿他身材的闊度幾乎大於高度。他摘下帽子，露出一個黑青的，頗像老翁短鬚的頭。他二十六歲了，但還有一種羞怯然而熱情的態度，好像一個學童。

苗對他歡呼，客人沉靜地跟苗握手，但顯然很滿意。『這位，』苗得意地把他介紹給我，『就是孫銘九團長！』蔣介石將軍就是他拘到的。』

過一會兒，另一個客人到了。他身材比較高些，年紀比較大些。穿着黑色軍服。他戴着無邊的眼鏡，鋒利的眼睛正在眼鏡後邊眯成兩條縫。他有一種典型的中國官員的神氣，臉上富於活力。他被介紹給我時的態度有些傲作，他說得一口好英語。『應德田君，』苗說。『張學良的秘書。』

我立刻感覺到自已對這三個人發生了不平常的友誼。苗連忙說明他們三人的關係。『我出主意，』他溫和地說。『應最聰明！』他定計劃。而孫——這位青年團長看來有些窘的樣子。『則是實際的人物。我們就是西安的三調鎗兵！』

我們談到深夜，因為還有許多事情對我甚至對苗都是一個謎。我最後終於獲得了一個關於西安事變的完整的故事。關於蔣氏恢復自由問題，在當時還得不到確定的報告——這顯然大大激動了孫氏和蓮氏。但在這叛城的第一夜，這全部事變的前因後果就像電影一樣展開來。委員長和張學良是兩個凸出的中心人物；但這不是表演個人野心的戲，我們從這戲裏可以體驗到士兵羣衆的憤懣。這不是個人的磨擦，而是崇高的政見的衝突；這是偉大的民族運動，有掃遍全中國的可能。我這時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認識西安事變還是一個大大的懸案。我們原以為蔣介石將軍一釋放，什麼都完結了，我此刻才知道此種見解是多麼錯誤！這一運動不得不繼續前進。

下面就是西安事變的故事，這是那些激起事變的人告訴我的。

八 劉匪時代的張學良

當張學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間率領東北軍進入西安的時候，中國西北的歷史展開了新的一頁那時候，東北軍（奉中國反日情緒最高漲的軍隊）的調動似乎沒有特別引人注意。但中國紅軍主力毛澤東部的先鋒隊的紅旗飄揚在陝省西部的邊界這件事，却使當地長官感到恐怖，使南京政府感到驚訝，使華北日軍總參謀部感到不安。爲了應付這種威脅，張學良被派往西北。

一九三三年熱河的失陷，使中國失去了兩倍於奧國的國土；使日本得在長城的城牆上豎起太陽旗，而張學良就在這時突然出國，一切都蒙在霧裏。原來大家都以爲這位年輕的司令，過去某些事變（例如十八個月前的滿洲事變。）都由他直接負責的司令，與其說是一個懦夫，不如說是魯莽政策的一個工具。但他個人的屈辱實在是受够了。熱河失陷後，張氏萬分堅決地要戒致命的毒癮，在危急的存亡的關頭，毒癮是他毒辣的敵人。這是走向一種有趣的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他在三年內走完了現代兩個極端相反的政治主義——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間的全部距離。

跟張學良一同從上海出發的，有他的夫人和三個小孩子，還有他當時密友齊亞諾伯爵。齊氏以前是意大利駐滬總領事，現在是意大利的外交部長，墨索里尼的女婿和繼承人。他們一直到意大利。張學良在那裏住了幾個月。他會見他所羨慕的墨索里尼，他沿着新築的公路驅車疾馳，他認爲這公路就是意大利建設的具體成績。張氏又訪問法國，極巧會見李維諾夫

。那時的張學良對於政治頗感興趣，急想聯蘇聯。但這一空願似乎沒有實現。關於這，有一個消息是這樣的：張學良曾向蔣氏任意將蘇聯對華的要求，而蔣氏又不願在某種條件的限制下訪問蘇聯。另一比較可靠的消息是：蘇聯當局恐高在遠東關係上引起可能的反響，如果他們把甸域的滿洲管治者逐回自己的國家去。不管原因何在，張學良總之沒有到蘇聯去。說他祕密訪晤莫斯科的消息，完全是無稽之談。

他在外國遊歷期間曾幾個月遊歷英國。在這個摩登的「世界的公民」看來，英國是意大利以外的最能引動人的國家。他在布來屯（Brighton）租了一座房子，把孩子們送進學校，後來又到倫敦，住在德徹斯特（Dulwich）結識了一羣奇異的朋友，其中有海爾先爵士（John Herbert）、亞瑟透夫人（Lady Astor）和曼克多那爾先生（Mr. R. Mr. Dodd）在遊歷的期間，張氏似乎重又變為花花公子，抓回他那失去了的少年。但他同時也收拾得許多印像，直到幾年後才將這些印像整理出來。他回國後所攝的照相是一個穿着蘇格蘭呢衣服（他愛玩高爾富球）的壯健的青年，看來至少比滿洲時代的他（那時他的身體很消瘦，有下垂的鬚鬚）要年輕十歲。

從歐洲回國後的張學良是偏法西斯帶嗎？配合着西安事變後一些關於他的傳說和他回國時中國政治走向顯明的趨向，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他那時對於領袖有一種堅定的信仰，那是沒有疑問的，蔣介石將軍是中國唯一的領袖，他這一信念從沒有動搖過。張學良回國後劈頭第一句就是『救國的唯一途徑就是擁護領袖。』這是遠在一九三四年的事，剛在『閩變』以後。這位墨索里尼的羨慕者在回國不久之後，就被給與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的職

位。

這詞街頭是聲神氣向。所謂「匪」當然是指中國紅軍和紅色遊擊隊；「共匪」一直被認為中國任何共產黨員或在任何紅軍將士的代名詞。那時候，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間，江西南部和福建的蘇區已很鞏固，而以瑞金爲首都。此外還有許多共產軍部隊在其他六個省份裏活動着，蘇區的人口約在六千萬以上。因爲那時的南京政府把「剿匪」看作政府政策的主要課題，張學良的這個新職位是很重要的。他於一九三四年四月間在武漢設司令部，向全體屬員訓話，說擁護蔣介石將軍和南京政府是他們的義務。但不久以後，他又發覺自己發生了許多疑問。

一九三四年是大舉進攻共產黨的年頭——這就是所謂第五次大圍剿，動員了南京政府所有最精銳的陸空軍。蔣介石將軍決心在這一年內肅清共產黨的活動，第一步就是進攻江西的紅色堡壘。東北軍是參加這一「圍剿」的。但他們的心都不在這裏。他們自己也是失去了家鄉的人，却要驅逐他們的同胞離開家鄉。他們的「圍剿」工作，並不比他們的擴散的司令更感到興味。不滿的種子遠在他們不戰而退出滿洲的時候，就種下了。只有一種戰爭是他們所歡迎的，這就是打回他們的老家去。

第五次圍剿的故事在中國是很熟悉的事情，雖然在外國不見得那麼爲人所週知。在這以前，已經有過許多次長時間的很費錢的圍剿，每次都遭受了阻礙。中國的地區有利於紅軍的作戰，紅軍的行軍比進攻的軍隊快一兩，而各地民衆都是站在紅軍威挾下。這時南京政府的計劃是要把主要的蘇區完全封鎖起來，使牠陷於孤立的境地，同時又不時更換進攻部隊。

(因爲南京政府的軍隊一跟紅軍接觸，不管時間長短，總要打倒紅軍的。)

蔣介石將軍在江西的省會南昌設司令部。南昌是六年前朱德所領導的暴動發生的地點，中國紅軍就是從這次暴動中產出來的。在第五次的圍剿中，蔣委員長動員了近一百萬軍隊，至少有半數直接參加作戰。南京政府傾其所有的兵力實踐剿共戰爭。還有計劃都出自德國軍事專家的心機；在這大規模的進攻中，重砲，坦克車，飛機，等等，無所不用，同時又在蘇區周圍建立起鐵圍陣線，跟着新公路和碉堡的完成，這個鐵圍愈圈愈緊，漸向紅色首都進逼。這次圍剿的費用非常浩大，生命的損失，特別是農民和非戰鬥員的生命的損失，實足驚人。而在過去突破了許多圍剿的紅軍也不能死守他們的根據地了。

但如果第五次圍剿的目的是要毀滅中國紅軍的話，則不能說牠已獲得了成功。紅軍被逼出了有五年多歷史的根據地，但他們的隊伍依然不完整的。他們突破了鐵圍陣線，衝入湖南的行動，博得了全世界軍事專家的反對，他們開始了有名的『長征』。『長征』的全部故事總有一天會被說述出來，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故事。這支爲數不到十萬的軍隊從福建的邊疆直到遼遠的西北，穿過湖南，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青海和甘肅，完成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他們到處都碰到對方軍隊的剋阻，他們毫不停頓地打出對方的重圍，而他們的領導權和紀律依然雜亂地保持着，雖然人數損失了一半。到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他們的先鋒到達陝北，他們在那裏同佔領這一帶地方有兩年之久的二十六，二十七兩軍聯合起來。

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紅軍長征的政治上的戰略。江西的中國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二年

就公然向日本宣戰。在遠遠的南方的深山中幹這蠻一着，看來似乎毫無意義，但長征開始的時候，這一舉動却獲得了新的意義。江西是有好幾年歷史的蘇區，紅軍離開江西，當然是一種退却而退往易於遭殃。但由於戰術，這一退却變成了一種最能說服人的教訓，證明紅軍的優劣和戰鬥力。中國共產黨所宣布的新政策使北上的長征變成一種逐漸走向『抗日統一戰線』的進軍，這是比上述一點更重要的事情。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產黨發出一通宣言，主張建立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本來很可以成爲無秩序的逃竄的退却，而結果却演成一種勝利的進軍。

西北地方對於日本的政策有一種戰略上的重要性，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日本佔領了滿洲和熱河後，軍事侵略的方向始終朝着內蒙古，顯然企圖切斷華北和蘇聯間通過新疆或外蒙的可能的聯絡線。控制西北可以保障華北的統治權，一旦與蘇聯開戰，還可以獲得交通線。這一切只要看一看地圖就會明白。所謂蒙古『非正式部隊』（作爲蒙古獨立的支柱的是從『滿洲國』的中國農民羣衆中強迫徵募來的軍隊）在一九三六年進攻綏遠，不過是上述那個總的戰略的另一個表現。

在歷史家看來，日本政策的比較使人樂意的特點之一就是牠的執拗性。日本國內政府的更換，許會影響日本軍閥的『大陸政策』的進行速度，但這一政策的基本要求——佔領滿洲以後應該佔領華北和蒙古這一要求，却始終不變。一九三六年的夏天，中國各地發現了一紙非常有趣的文件，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喜多報告書，牠詳密地檢討着這些問題。正如有名的田中奏章一樣，這一報告書的真實性如何，尙難確實證明，但牠與日本目前所實施的政策是

那樣相像，簡直可以看見這是絕對靠不住的。報告書內主張用間接手段（如策動蒙古人的『獨立運動』，策動中國各民族的『獨立運動』，策動『滿蒙獨立運動』）這種報告書的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對於陝西紅軍的『不滿意』，完全是用『紅軍的大隊』。『雖然中國官方報紙竭力削弱陝甘寧的共產黨，但陝甘寧地的重要性，終於終不能使日軍滿意。』『劇國』以為維持中日政府的『親善』的一個基本條件。

當紅軍向陝北進軍的時候，張學良自己已經穩定版圖的一切可能性。他們渡過四川的河流，越過西康的山嶺，到陝西的高原，這是漢族最初發源地，也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能夠佔領陝西高原，他們就會鼓動後方的民氣，實踐全民族的抗戰。不單日本看出了這個危險，『劇國』也說：『在抗戰中，南京政府也早已看出了這個危險。他們用盡手段阻止紅軍與日軍以爲日軍所稱謂的日軍軍隊接觸。這點西北的紅軍是一個危險的徵兆。』

一九三五年是紅軍長征的第四年，也是張學良一個很重要的年頭。他住在武漢舒適的司令部裏，瀟湘日軍從湖南渡湖，佔領長沙，但他也跟全國人民一同感受到日軍侵略的每一個襲擊。何梅協定是一項特殊的協定。『張學良知道關於這一協定的正確的材料，後來在西安的報紙上公布了這協定，其內容完全歸於廢款。他開始懷疑自己所遵循的政策。他那時候在漢口處於如下的地位：『張學良的國家，備我接受了』『不抵抗政策』，但現在我希望我的領袖改變我的職務，從總司令工作轉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抗戰。我深信抗日的犧牲比在剿匪的戰役中所受的犧牲更有價值。』此後不久，察哈爾的危機又出現了，宋哲元在日軍的壓力面

前辭了職。張學良又非常憤慨，在一次公開的演講中說道：「『九一八』事變後，我們總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憑藉國聯和訂立另一種和平協定，竟能拯救我們。我們退讓，因為我們希望外來的援助。現在，一切幻夢都消滅了。我們必須自己幫助自己，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我們必須死裏求生。政府應該動員全國軍隊抵抗日本。」

這些言論是很有意義的，表明張學良在去西安以前已在日益加甚地懷疑中央政府的政策，雖然他個人依舊忠於蔣介石的軍隊。但到了十月，他奉令率部進入西北，對付新到的共產軍。這時候，他似乎又被南京政府解職了：「剿匪」是抗日的第一階段。

到了西安，張學良急着想在剿匪中獲得結果。因為國民黨大會不久就要開幕，而事前已有人控告他失職。他下令立刻進攻，但結果這受到嚴重的打擊：在接連的兩次戰役中，他的部隊都受到慘敗。兩個最精銳的師團第一百零一師和一百零九師投入了紅軍的隊伍，師長陣亡。

這是張學良進攻紅軍的最後一次戰役。到一九三五年末，他相信紅軍是不能用公然的攻擊來加以毀滅的，他把這個意見報告南京政府。東北軍依舊屯駐在西北，但對於紅軍的進攻却一月小似一月了。東北軍上與紅軍締結了一種類似停戰協定的條約，而不久之後，由剿匪司令部祕密加以履行。共產黨人所運用的最成功的口號，就是那個簡單的語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句口號於東北軍有一種不能抵抗的力量，他們由此知道紅軍是同他們自己一樣的抗日軍隊，紅軍所要求的不過是開到華北去抗日，而東北軍的弟兄却攔阻他們。

這時的張學良漸漸明白了一些事情。第一，他懷疑蔣介石將軍把東北紅軍派到西北去打

紅軍的動機了，是費了解東北軍原來十五萬調州兵已被分裂成好幾部份；牠的確也被分裂了；一部份隊伍仍駐在冀南，由馮玉祥率領。張部在一九三五年最後幾個月打了苦仗之後，很得到一兵一卒的援助；餉銀不能經常照發，而由五千萬『棉麥借款』所購置的大量軍火，全部用於全國的第五次圍剿，東北軍也得到一鎗一彈。即使張學良本人沒有想到這些地方，他的部下和青年軍官立刻向他指出：南京政府又在運用過去獲得成功的戰術。

同時張學良日漸注意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的全部問題。他研究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過去歷史；他從那些被紅軍俘虜過去而又被釋放回來的自己部屬聽到一些蘇區的真實動態，張氏在六月間會見紅軍的政治領袖之一周恩來氏，跟他談了一次話。周恩來是一個出色的人物，他過後又在西安事變中出現，成爲這一事變和平解決的主要動力。給與張氏大影響，是他的一個青年團長高福源，他在一九三五年初被紅軍所俘，在蘇區住了好幾個月，回來時熱情橫溢地報告軍的組織和訓練，報告着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張學良因此得到結論：把中國青年人——學生，一般知識份子和兵士——起入共產黨陣營裏去的主要動力是錯覺的對於南京政府對日政策的不滿。

而在共產黨方面，自從宣佈了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之後，就處處表示讓步。一九三六年初，一部帶有三萬枝來福鎗的紅軍侵入晉綏平到達太原。但這主要的不過是一種帶有試探性質的行軍，同時也是紅軍新政策的一種武裝表演。舊的反國民黨的口號都被放棄了，而代以民族自衛的口號。共產黨在一九三五年所發的宣言就完全集中在民族抗戰的問題上。紅軍自動退出山西帶走大量奪取來的藥彈：在這次進軍中很小沒收富人的財產。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毛澤東發表談話，把統一戰線政策的理論與實際發揮得更爲充份。這時候，東北軍和紅軍中間存在着實際的諒解，而張學良也變爲紅軍所號召的政策熱烈的擁護者了。我們應該注意：這一新政策的兩個基本特點是完全跟張學良在滿洲開始繼承父位時所號召的政策相一致的：停止一切內戰，團結全國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

張學良在最初被紅軍打敗後的幾個月中僅僅扮演着被動的角色，而現在却開始站在主動的地位上，依照各黨各派聯合戰線原則幹着救國工作。西安成爲反日宣傳的中心，此種宣傳在中國其他各地也同樣熱烈的行着。東北軍的抗日情緒已到了狂熱的程度，張學良特別在西安附近的王曲設一軍官學校，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並重。東北軍的士兵開始由一羣非常急進的青年文武官員所領導。不久以後，曾由瀋陽遷到北平的東北大學，有一部份搬到西安，成爲愛國宣傳的中心。張學良又從北平招來了二百左右的學生，組一特務團，開一政治訓練班，以孫銘九爲團長。到一九三六年的秋天，抗日組織的一個堅固的根據地在這西北被建立起來了。

這一切都逃不了蔣委員長偉大的計畫他開始覺得西安有加以監視的必要。西安主要的國民黨代表就是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邵主席是一個『忠實』的長官，的確是靠得住的；但他沒有兵力，只有少數特別警察和憲兵。而在另一方面，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却有四萬西北軍，而且是一個可怕的好戰的腳色。邵氏看見楊虎城和張學良日漸接近，大爲驚異；而張氏的部隊又跟紅軍簽訂了停戰協定。驚人的消息不斷地通過電報從西安傳到南京。

這是十月下旬的情形，蔣介石主席就在這時親自飛往西安調查實情，張學良又把過去一

再說逃過的議論對他上官復述一遍。；他們要求下令抗日。特別是蒙古的『非正式部隊』進攻綏遠以後，他們給與了南京政府一個直接察哈爾的機會。張學良說：因為紅軍不是真正愛國的中國人，爲什麼不跟他們議和，而使所有利口指向民族的敵人？甚至在這一時期，蔣介石將軍對於當前的局勢似乎還有非常正確的估計。在對軍官們和軍校的學員們的幾次演講中，他堅決認爲一切抗日的高調都是熱血的；要抗日必須先平內亂近在目前的敵人，東北軍必須加以痛擊的敵人，就是共產軍。

當全中國都燃燒着『保衛綏遠』和『強化對日外交』的愛國熱情的時候，蔣主席却在正確地準備向日本的侵略軍作新的進取。東北軍當然是靠住了，他因此把牠隔絕開來他所信任的中央軍。他部下最精銳的司令官之一第一軍軍長胡宗南將軍奉令北上，代替遲遲不進的東北軍來進攻萬惡的日軍。到十一月的初旬，胡宗南部開始神速地進入甘肅。

但這些隊伍對於自己在民族危殆如此嚴重的時候去做剿共工作，也不見得不怎樣愉快。他們向北開拔，以爲自己是去援綏的。當他們明白了自己向西移動而是北上的時候，他們堅決要求嗣了雙洞，才肯前進。胡將軍勇敢地深入蘇區八十里左右，但看不見一個紅軍。他於是忘掉顧忌，重蹈了他以前剿共奮鬥的覆轍。他的部隊同入一所無水的狹隘的山谷，他最精銳的第一師有兩旅於十一月十八日被紅軍切斷了後路，給他們包圍起來。三天後，軍再度進攻胡將軍就打了一次彼此平權的仗。新的『圍剿』的第一仗就如此結束了。

張學良匪徒在公然的『圍剿』中，在他們自己的根據地，擊敗軍的困難。他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日又向委員長提出申訴：綏遠的危機是到了頂點了，他再不能控制他的部隊，除非他至

少動員一部份隊伍到抗日的前線去。委員長請這位喋喋不休的剿匪司令到洛陽去，但對於張氏所提出的問題，都給以嚴正妥善的回答。他設軍隊不過山西，因為閻錫山要反對；飛機不能飛往綏遠，因為空氣寒冷。委員長說共產黨是民族的主要敵人；什麼都不能阻止剿匪工作。洛陽會談的唯一結果，就是委員長答覆不久再到西安向東北軍和西北軍官訓話。

張學良回到西安，西安的輿情大為憤慨。當援綏的需要萬分迫切的時候，當全國民衆都相信他們正在開往綏遠的時候，中國抗日情緒最高漲的軍隊却受命準備另一次屠殺萬惡的共匪的『圍剿』。西北軍官們一致立誓參加抗日運動。情勢一天緊張一天。

而蔣介石將軍及其隨員們就於十二月四日的早晨從洛陽進入這簡直是公然抗命的不安的氛圍中。

九 有 趣 的 重 逢

陷阱是緊閉着了，而蔣介石將軍就落在她裏邊。西安人士聽取這消息時不無驚慌；委員長的被捕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但就大體上說，大家都是猜測着事變發展的前途。

西安城內整日戒嚴。店舖都關上排門；銀行不開；商業停頓了整整一個上午。但到了下午，人們又在街上走動了，雖然任何羣衆都有被兵士們攔阻和檢查的可能。沒有什麼搶掠情事，在一度驚慌之後，一切都復平靜。

當時留在城內的外國人曾發出誇張的報告，說當日局面如何恐怖，誰都不敢在外邊走動，任何外國人都有被殺的危險。這些故作張皇的人們所散播的故事的唯一可能的根據，就

是那天早晨發生的一個悲慘事件：一個年青的德籍牙醫生溫斯哈（Dr. Wunsch）不聽朋友們的勸告，冒險出街。他不懂中國話。當兵士在十字路口喝令他回頭的時候，他聽不懂，一直走入火線。他身中三顆機關槍彈，被抬到他的家裏，不久就死了。西北軍事當局對這深為抱憾。而這一最不幸的事件就成為許多完全無稽的流言的根據，說西安華人排外情緒如何高張，外籍居民如何危險。只有日本人倒真有些危險的，幸虧西安城內沒有一個日本人。西京招待所裏有一個不幸的中國人，面貌很像日本人，被人用槍擊穿險部，到他的真正國籍被發覺時已經太遲了。有些外國人——特別是住在『招待所裏』的外國人——暫時受到一點不方便的痛苦，但沒有一個受到十分難堪的痛苦。

在那些讀過歷史上人物性格的矛盾的人看來，西安事變最獨特的姿態，就是張學良性格的改變。張氏對蔣介石將軍的態度一向都是學生對師長的態度，而這位張學良竟敢扣留他的『長兄』，給以『兵諫』，這是駭人聽聞的事。由於這一舉動，張學良第一次以堅毅的人物的姿態出現在中國舞台上。許多過去跟他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向來是抱着理想主義的，但他的理想主義竟會引起這樣迅雷似的革命的行動，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

但跟着『雙十二』事變的順利的成功，張學良的真正困難也開始了。最大的困難就是西安完全跟外界隔絕開來，張學良一定很知道他的舉動的錯誤，他也無法向外界解釋他的動機。舉個明顯的例子吧：他於委員長被扣後第一次發出的通電的全文從沒有在中國各報上披露過，而同時又有外籍通訊記者把他寄到國外去，現在這裏有把全文轉載一下的必要。從張學良的語調可以看出他此次舉動的真正動機。

這是一通拍給全國的電文，頭上的稱呼是國民政府執行委員會，各省政府主席，各報館各學校。

自從五年前東四省失陷以來，我國主權日益削弱，國土日益縮小。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均為吾人之國恥。凡屬國人，對此無不痛心疾首。

近來國際情勢大變。一二強國互相勾結，以我國土地與人民為犧牲。張學良對此極為憤慨，衆信蔣介石將軍及國民政府事前一定知道此事。綏東戰事爆發時，民情憤激達於極點，各地士兵亦極憤慨。

在此存亡絕續關頭，我中央領袖鼓勵軍政長官組織全民，一致實行民族自衛戰爭。但當前線衛國士兵浴血苦鬥之際，外交當局依然講求妥協之道。

上海救國領袖被捕，全球人士大為震驚，舉國同胞義憤填胸。愛國竟成罪案，前途何堪設想！

蔣委員長為一羣不智謀士所包圍，已失人民大眾之擁護。彼所推行之政策使國家受害匪淺，實應自疚。學良等揮淚奉勸，請其改變政策，但遭拒絕，且被斥責。

我等因向委座致最後勸告，保其安全，促其覺醒。

西北軍政長官一致提出如下之要求：

- 一、改組南京政府允許各黨各派參加，共負救國重任。
- 二、停止一切內戰。
- 三、立刻釋放上海被捕救國領袖。

- 四、釋放全國政治犯。
- 五、解放民衆愛國運動。
- 六、保障人民結社集會之政治自由。
- 七、實現孫總理遺志。
- 八、立刻召集救國大會。

上述八條是我等及西北全體軍政長官，致堅持之救國綱領。

我等希望各位先生補從公議，誠心以謀此等要求，藉以補償過去糟蹋國家之錯誤，爲未來開一生命線。大義當前，不容反顧。我等爲求民族解放，爲謀國家福利，希望上述政策付之實踐。爲功爲罪，留待國人公判。此電本陣迫切待命之至。一九三六：一二，一二於西安。

在電尾署名者有張學良、楊虎城、于學忠，以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一批將領。但此外還有蔣鼎文，陳誠，以及蔣介石特軍屬下，些將領和在當時簡直沒有自由可言的各種官員，邵力子當然包括在內。張氏假借與宣言的精神相反對的領袖們的名義，這是戰術上一個絕大的錯誤。他而不了解，反使那些不願受張氏網領的人們懷疑張氏的動機。張學良是一個蹩腳的戰術家；蔣介石則更替名不實傳的。

在中國，所有宣言的錯誤大都由於此情。但這八項要求都是進步的民主的主張。第一項當然預示分裂近十年的國共兩黨的重新聯合。特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第七項，主張聯合一切以平等待中國的友邦。而其餘各項，要求給與更廣泛的政治自由，也是全中國自由主義者

和民主主義者多年的願望，雖然許多年來一直不能公然發表此種願望。

西北當局認為扣留蔣介石將軍是一種最无效的辦法。南京政府當然有充份理由可以厲懲此種非法舉動，但張學良却很知道沒有合法的方法可以運用。張氏在事變發動後最初幾天所努力的，是向民衆保證委員長的安全，企圖引起全國各地人士對他八大綱領的可能擁護，但事實證明他在這兩方面的努力，僅僅獲得部份的成功。

蔣氏被捕的最初消息是那樣使人激動，而且帶來那樣多駭人聽聞的謠言，簡直沒有人相信張學良及其夥伴們的誠意。爲要證明此種誠意的真偽，當然只有直接跟『叛軍』接觸。這件工作留給委員長的英籍顧問和張學良的私人朋友端納去幹，他在事變爆發後的星期一飛往西安。端納目睹委員長確未被害，而且頗爲舒適，於是電告南京政府。過後張學良又電中央政府，請派口力大員來陝根據八大綱領商討改變國策的全盤問題。如果政府能提供決不進攻西北的保證，則張氏準備恢復委員長的自由。

但南京政府沒有派人去，看樣子，除了戰爭，似乎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這一事件。

當時軍事情形是很複雜的。蘭州的東北軍受了西安事變的影響，於十二月十三日揭起反中央的叛旗。這變一來，甘肅的兵力完全操在李學忠和趙宗晉（譯音）的手裏。胡宗南部第一師曾於三星期前在甘肅爲紅軍所敗，這時已撤至東南部天水附近，跟胡氏第一軍其餘部隊完全失掉聯絡。還有高桂滋部和高雙成部等中央軍駐在陝北，但有紅軍可以監視他們。如果南京政府要實行有效的進攻，必須從涼州沿隴海路進發。進攻西北顯然不是很容易的事。

在西安，每天在街道上和公園裏開羣衆大會，慶祝西北所獲得的新的政治自由。十二月

十六日在『革命公園』開一個大會，張學良和楊虎城一同出席，說明扣留委員長的理由。這時張學良對於自己的處境，有非常詳盡的說明。他的演詞中有一段是這樣說：『從我個人的觀點說，我過去同蔣將軍有非常密切的私交。我們兩人的意見不同之點在於他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去年我時常用文字和口頭請他放棄『行政策。他拒絕了我一切的請求。』

『最近蔣將軍逮捕並拘禁上海救國領袖……他們大多數該連認識都不認識，但我對他們的被捕表示抗議，因為他們的主張跟我的主張一樣。我會對蔣將軍說：『你對付民衆愛國運動的手段的殘酷正如袁世凱和張宗昌一樣』蔣委員長答道：『這是你個人的見解。我們的行動是革命的行動。』

『同胞們，請你們公判一下：這是不是滿意的回答！因為蔣將軍不願掉轉槍口指向敵人，我不得不聯合楊虎城將軍和西北所有民衆領袖發動革命的『雙十二』事件。我個人沒有權利或地盤的野心。剛剛相反，我願意站在前線同我們所有武裝同志一塊兒跟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

要把中國政治演講的富於感情的詞句翻譯成外國的習慣語，原是很困難的事。牠們熱情橫溢，辭藻斐然，很像拉馬丁（十九世紀的詩人兼政治家。）的熱情的雄辯，不像我們現代政治家的拘謹的演說，或日內瓦的吞吞吐吐的無謂之談。但張學良在西安事變發動後的演說雖然質樸無華（也許正由於牠的質樸無華，）卻具有真正的誠懇的腔調。一個成功的外交家爲要增強自己演說的效果，往往故意運用這種詞句，但張學良並不是外交家。

當蔣介石將軍被迫在新式寓所裏過着隱居生活的時候，也有來會見他的人。張學良每天

跟他談話；楊虎城和別的軍事領袖也來與他討論中國的命運，有時探說服的口吻，有時用激烈的整詞。蔣將軍最初對這一切勸告的反應當然只有冒火。但有一天來了二個別的客人他們的態度安閒沉着他們的面貌對於被囚的委員長也不是陌生的。

讓我們回顧一下十年前孫中山先生沒有看到的『大革命』的開頭吧。蔣介石將軍是一個能幹的青年幹部人員，那時充當黃埔軍官學校校長，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先生所創辦，用以訓練國民革命軍的幹部的。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名叫葉劍英是黃埔軍校的軍事教官，後來又充蔣將軍部下二十一師師長。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是一個從法德留學回來不久的青年共產黨員名叫周恩來。

一九二七年，以蔣介石將軍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已經佔領了南京。上海——中國的心臟，國際帝國主義的遠東焦點——進在反動軍閥的手裏，由外國的巡洋艦上的大砲守衛着。周恩來被派到上海組織一次暴動，而在最初幾個月內，近一百萬工人參加總罷工。罷工是被鎮壓下去了，但革命尚未出現。周恩來及其同志們趙世炎顧順章和羅亦農等，組織了糾察隊（是由工會派出監視罷工工人不准自由復工的糾察隊。）和幹部，武裝了三百名工人組一敢死隊。到三月二十一日，另一次總罷工使上海的工廠都關了門；在完全以寡敵眾的情勢下，他們佔領了兵工廠，而上海就落在暴動的工人們的手裏。五千工人武裝起來，蔣介石將軍於幾天後就率領國民革命軍到達上海。

全世界都知道這事情的後果是怎樣的：牠已成爲現代一部很優秀的革命小說（指法國名作家馮爾洛的小說人類的命運。）的題材。在一個月內，工人們都被解除了武裝，國民黨左

（包括共產黨員）右派間的裂痕發展成了公開的搏鬥，就在這個時候。

當五千革命同伴和一些與周氏的關係最密切的同事都在上海事變中犧牲了的時候，周恩來由於一個黃埔軍校的老朋友的幫助，逃往武漢。他此後接連參加每一次暴動：南昌暴動（朱德組成了第一支紅軍，）汕頭暴動（共產黨最後一次企圖佔領一個口岸，）以及冒着絕大危險的廣州暴動，他跟葉劍英一同參加『廣暴』，『唐暴』失敗後，葉劍英逃到莫斯科，在那裏住了兩年。一九三一年，周葉到達江西和福建的蘇區，他們此後一直跟紅軍在一起。

當他們在西安跟蔣介石將軍重新見面的時候，周是第一路紅軍的政治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別人用八萬元價格購買他的頭顱：葉是東路紅軍的參謀長。這是一種很有趣的重逢。

共產黨人在西安事變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呢？真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在西北紅軍與張學良間的確存在着深切的諒解，但『雙十二』事件全由張學良和東北軍『急進派』發動的。

『事變』發動以後，張學良立刻派一架飛機去迎接中國蘇維埃政府的代表們到西安來，請他們公開參加『叛都』的會議和組織活動，一個名為『西北抗日聯軍軍事會議』的新的權力機關被組成了。來到西安的共產黨小小的代表團，沒有帶來紅軍，而結果發揮出絕大的力量，對於西北運動的整個過程有決定的作用。這個代表團包含秦博古（貓頭鷹臉，說話很慢，共產黨前任書記，該黨最優秀的理論家之一。）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別的幾位。而在此後幾星期中，當以周恩來所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周氏原是蔣介石將軍以前的助手。

保安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在十二月十九日發出一個通電，表明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牠在這通電裏說明自己深信『西安諸領袖的舉動完全出於愛國的熱情，他們切望立刻確定抗日的國策。』這個通電提議召集各黨各派在南京開和平會議，主張京陝兩軍訂一協定，以潼關爲界。因爲其中有一項提議在那時過於前進，對方當局不加考慮。

南京政府立刻派兵到潼關，好幾個市鎮受到轟炸。一隊政府機在西安低空怒吼着，牠們的引擎的聲音。除在臨潼上邊山腰上的幾小時以外蔣將軍的一些最危險的時候都是在被囚的時期內，他那時也跟西安其餘的人們一樣，等待着第一次的空襲。

聽說某些份子想把委員長領出來受民衆的裁判，用民衆表決方式判處他的死刑。如果誰有理由幹這樣的事，那當然是中國共產黨人，這全然是一種戰術的運用，但至多他們應得瞭解自己政策而且忠於自己政策的美名。某些集團和個人，特別是東北軍的左派份子，贊成處委員長以死刑，但他們自身毫無組織，而且在委員長留在張學良總部的時期內，他們有什麼權力。

蔣委員長在被扣的期間怎樣消磨他的時日，不得而知。他在恢復自由以後發表了被囚的兩星期的私人日記；據他自己的報告，他每天讀許多小時聖經，這是一種消磨時光的老方法。他有許多時間可以思考，這倒是千真萬確的。而當時發展的情勢提供他思考的材料，我們往後會看到這一點的。

本章是『文件章，』所以用張學良在十二月十九日給倫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弗拉塞先生(Mr. Fraser)的私電節摘錄來做結束，未始不可。這通電報當然被南京檢查員所扣留

，許多期星還沒有到達對方之手。他是對於外報最初關於西安事變的評論的反響，同時又證明『叛軍』在致命的被隔絕的處境下工作的困難。

『秦晤士報』用以責我扣留委員的舉動的罵的然而不正確的評論，已經拜讀過了。我知道世界各地將湧起同樣的譴責，因為大家不瞭解當時逼迫我扣留委員長的處境，不瞭解我此種舉動的真實原因。委員會用全力扣留別人者辯護過，更不能留身居高位的委員長的舉動辯護。我因此深覺抱歉，因為當時的特殊處境強迫我做出這樣的事。

事實並不是如秦晤士報所攻擊的一樣，我沒有『個人的野心』，沒有『爭取較好條件的希望』，『迫使我扣留委員長的，不是任何私人的動機，這事情的動機很簡單，就是要我們的政府明確地改正現行的國策，實行武裝保衛我們的國家，斷然停止在不斷的內戰中千百萬中國金錢、中國人命和中國財產的耗費，停止圍剿所謂『赤匪』，他們雖然見解不同，但到底是中國人，他們至少不會像日本人一樣危害我們的國家……』

我們已受這國人的責備，我沒有推避責任，但我不是中央政府，我沒有力量發動全國的抗戰……但我們渴望中國軍隊抵抗侵略的敵人，不要攻擊中國的民眾。國軍迄未移動一步去實行抗日，但牠為要進攻我的動員却像飛風一般的快，當敵人正在我們國境的時候……。

我們切望着委員長的領導，我們無論如何不願意他的權力被人剝奪……。我們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沒有威脅着他的生命，沒有損傷他的地位，他在我們的心目中依然是

委員長……他所以尚未恢復自由，這不能責怪我們。

我在前星期一的晚上，請南京政府派員徵取委員長的意見，跟他商討止內戰爆發的必要措置。……委員長跟我們一直等待南京方的能員來此處理這件事情，使委員長能夠回京就職，但竟沒有等到。這事情竟延得這麼久，實在奇怪得很。如果有人來到這裏，則委員長早已回到南京了。

然而他還在等待着，他在這裏受人尊敬，沒有什麼不方便的地方，而且存端納先生陪他在一座新式房子裏，沒有誰去捉弄他。當他回京的時候，我準備他回去，站在國人面前受冷靜的公平的審判。如果他們聽了我所說述的事實以後認為我的舉動謬誤而責罰我，則我願意承受任何責罰，甚至死刑。 張學良啓

完全相信或完全不信牠都可以；外交上的兩害總要打些折扣的。凡是最熟悉中國事情的人都知道公函的文告很少官話而的實話。但上述那通電報所述的事實却是千真萬確的。在中國，任何事件都與金錢有關，因為金錢是信用的徵號。但張學良的錢已經够多了，他不需要為着獲得更多的錢而從事戰爭。他所希望的委員長的隨身價，就是中國新國策的確定，而這一點，畢竟沒有什麼能向他提供保證。

十 西 瑣 記

『西京招待所』是一座巨大醜陋的房屋，然而西北的省會，牠是最出色的新式旅館。一列很漂亮的汽車停在門口，因為這時有許多東北軍長官住在這旅館裏，他們毫不介意前些時

住在這裏的一羣長官的命運。這是西安最時髦的集合地。

我到這座旅館有如第一隻燕子，一個恢復營業繁榮的吉兆，來自上海的寧攬顯然對於東北軍的軍官優客感到厭煩。他喜出望外地歡迎着我。

『先生，你坐飛機來的吧？』

『不是，』我十分肯定地說。『我坐過黃包車，騎過驢子，也搭過軍用卡車。』他顯然不信任我。但他給我一間房子，向我道歉，說從十二月十日以後，這裏一直沒有外國報。

旅館籠罩着陰謀的氣氛。在幾間後房裏時刻開着會議；軍官們進進出出，帶着中國軍人不常有的一種緊張、堅決的表情。甚至怪舒服地靠在大門口椅子裏的汽車夫們也帶着一種神祕警覺。任何人一踏進大門就得受衛兵、便衣隊員、以及監察便衣隊員的密探的檢查。情景是很刺激人的。

在第一天早晨，我已準備好跟苗應和孫——『西安的三個槍兵』——去遊臨潼，看看委員長被俘的場景。苗穿着中山裝來到旅館，很自得的样子，彷彿他有許多工作可做似的。我覺得他和應對於當前的局勢絕對樂觀。

我知道了事變以後，沒有別的外國人來到西安。我本來預料頓當在西安等我，但結果未如所料。委員長被釋放以後，只有一羣外國人離開了西安，但沒有外國人來到西安。大多數人都以為交通即將恢復，他們是大大地失望了。

應偶然向我說：『你知道還有一個外國新聞記者在這裏——一個美國女人，史沫特莉女士？』

『什麼——史沫特莉？』

他點點頭。『一點不錯。她正在這旅館裏。』

這是一個新奇的消息。史沫特莉是中國最著名的外國人名之一。牠在我所知道的北平學生羣衆中簡直成了一種傳奇；因爲這位『中國人的命運』和『中國紅軍行進』的作者在中國青年羣衆中所獲得的熱情的讚衆恐怕比任何別的外國作家都要多，除了高爾基。

一九二七年以後公然與中國革命發生關係的少數外國人中，史沫特莉的確是最活躍，最鯁直的一個，她已成爲革命運動中的海燕。她在中國外人隊伍（其中很少人看見過她）中的聲名證明她是一個戰鬥的活躍的人物。她在通商口岸被人們看作鮑羅廷的正式繼承者；據說她跟孫總理夫人一同做過工作；大家都以爲這是以掩護其他更危險的場合的。粗俗的上海人對於史女士的私生活加以大大嘲弄過；一個嫁過印度人的婦人在中國是一個嘲弄的絕妙對象。真正同情被壓迫民族的鬥爭，已經是够壞了；而站在被壓迫民族方面與壓迫者抗爭，那是不能饒恕的罪惡。

當十月間我在上海的時候，當楊樹浦各紗廠的大罷工，把數千男女工人驅上街頭的時候，日文報紙大聲宣佈『美籍特務史沫特莉』是大罷工的鼓動者。我知道這是胡說，因爲當時我會找過史沫特莉，結果發覺她不在上海。她已在西安，住在華清寺的溫泉旁邊，寫着另一部關於紅軍的著作。我突然意識到：大多數人一定要說她在西安，另有作用。我立刻發覺事實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看了她許多描寫中國的著作和那部出自女作家筆下的最足驚人的自傳『大地的女兒』

後，才知道她的爲人。她從美洲濶闊的堦境（譬如市鎮的赤貧，西南的高原和大山，以及「大街」和大城市）回到歐洲，在德國所呆的大致教了幾年書。她最初對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所吸引，她與這一運動發生關係。結果在美國印度獄裏過了幾星期的拘禁生活她對於東方已有一種特殊的感情。由於出身和階級意識的關係，她是一個革命家，她爲爭取獨立和教育之多年的鬥爭堅強了她的性格。她必然要來到中國，因爲全世界最偉大的革命運動正在中國遭受着嚴酷的壓迫。

她終於以 Frankfurter Zeilung 的通訊觀者的資格來到上海。她在中國找到了一種工作，這工作吸引了她的全部精力，這工作比頭緒紛繁的印度民族主義運動更有意義得多。她許多描寫中國的著作的，確是最初向國際大衆介紹了中國各種社會勢力的鬥爭的面貌。她的著作有一個集體的主人翁——中國紅軍。她有豐富的材料。不管批評家怎樣批評，她到底把她所鍾愛的紅軍領袖朱德、賀龍和毛澤東等活生生地介紹給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和第特洛（Dortmund）（杜塞爾多夫和第特洛都是德國的城市）的工人了。

當我在名片上寫了『我在上海認識了你的一些朋友』等字樣，交給茶房送進去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會得到怎樣的接待。我在旅館的門廳內等候着，我覺察到從各方面投擲過來的偵察的目光。

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跨着大步，穿着粗布鞋，一手拿着我的名片。她身材短而強壯，配着一張久歷風霜臉，頭髮，兩隻眼睛很大的黑白的眼睛。

『這位就是勃脫蘭先生嗎？』聲音很粗，有敵對的調子。她穿着紅色羊毛衫，棕色的裙

，笨重的靴子。

『是的，』我說。『你不認識我，但我在上海認識一些你的熟人。』我說出他們的名字。

『不錯，』史沫特莉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這原是我問她的問題。但我現在不得不回答她：我到西安來，完全由於一種自然的好奇心，想明白西安事變的真相。寫一些文章。我又說明自己跟幾家英國報紙有關係。

『哪幾家報紙？』史沫特莉的神情是冷酷的。我說出『每日報知，』接着又說出『泰晤士報。』

『倫敦泰晤士報不是中國的女人。』她的嘴巴像陷阱一樣地緊閉了。『你怎樣來到這裏的？據我猜測，你也許是英國偵探。』

真是糟糕。『我跟一個東北人同來的，』我說。『你願意見一見他嗎？我們正要同孫銘九到臨潼去。』

這個三星期前還不大有人知道的名字使她的印象好轉了。史沫特莉似乎樂於會見擔任委員長長的孫銘九；但她對我依舊有點懷疑。『你在西安還認識別的人嗎？』她問。

我再碰一碰運氣，說出張學良的『西安日報』的一個年輕編輯的名字。幸得牠會過他的。

『是的，我認識他。他是你的朋友嗎？』

『我們在北平常常同往的。他會證明我不是偵探。』

『好的，』史沫特莉堅決地說。『我問問他看。』

這是我們二人結識的開端，而在我證明自己跟國際帝國主義無關以後，我倆的交誼很快地發展起來。我不久發覺了史沫特莉在當地很有名氣。西安的外國人（大多數都是傳教師）都知道她在事變前一個月就到西北來了。但她是靜靜地住在臨潼養病，從事著作，却為他們所不願聞。蔣介石將軍的到來，擾亂了她的山居生活，她於是來到西安城內，住在『招待所』裏。十二月十二日的早晨，楊虎城的軍隊衝進她的房間，她像這旅館裏別的客人一樣，失去了錢和值錢的物事。甚至這件事實都被人解釋為欺騙的傑作。因為傳教師相信共產黨人是事變的幕後策動人；凡是共產黨人所計劃的事情，史沫特莉決不會不知道的。因為他們毫不理解西安事變的真相，這件事就給與他們一些談話的資料，他們沒有錯過他們的機會。

史沫特莉一開始就喜歡孫銘九，因為他表演過『直接行動』我們共乘兩輛汽車到臨潼去。天氣清明，陽光燦爛；這時的西安比北平暖和得多。在委員長恢復自由後的幾天內，西安的一切都顯出愉快的氣象。追在眉睫的戰爭危機似乎遠開去了。

在臨潼城禱的外邊，離華清宮不遠的田野中央，騎着一架小型飛機，飛行員們正在牠上邊忙碌着。用油漆油成的大字，說明這是北平市獻給委員長的祝壽禮物。這架飛機於『雙十二』早晨飛抵此間，顯然是奉命救出蔣介石將軍的，而結果立被東北軍扣留。牠此刻正準備跟別的幾架政府機一同返京。

我們詳細地視察華清宮，孫銘九指示我們那天可紀念的早晨的出事地點。我們爬上蓋着白雪的山坡，蔣將軍最初就是沿這山坡逃走的，後來在「虎背石」內重被拘住。（酷

愛紀念物的中國人已經開始這地方建造一個亭子，而且在岩面上刻着『我國國運從此更生』等字樣——這不是沒有見識的。苗精神煥發；他執意要同他兩個朋友在蔣將軍曾在裏邊睡覺過的房子外邊合攝一張照片。他想起那個日子，激動得什麼似的。

他接着到有名的溫泉洗浴，中國絕世美人楊貴妃就時常在這溫泉裏洗浴的。我仍舊用法文跟張學良的一個年輕的表兄弟談話，他曾在馬賽學習過航空。他的帽子壓在一隻眼睛上，很自得的樣子。他認為西北前途的展望是絕對可以樂觀的。『但副司令不應該到南京去。這不必要，而且對他很危險。』

苗君浴罷歸來，容光煥發；他很愛臨潼。『我有一次在這裏過了一個月的流放生活，』他告訴我。『張司令說不願意再看見我，因為我像一個日本人。因此我就在溫泉過了一個月的假期。』他在西安的大部份時光彷彿不是獲得上官的極端寵愛，就是過流放生活；他指給我看西安城牆上一座城樓，他曾在這裏邊被拘禁了好幾星期。我知道如果把他某些比較粗魯的計策在不適當的時候付之實行，則難保不出毛病。但他高度的反日熱却在張學良的心目中抬高了他的價值。

這計劃逮捕委員長的三個東北人都很年青。他們對於此次事變都很大感興趣。『你知道委員長在最初五天內只微笑過一次，這就是在他愛國愛民和統籌自強的時候！』應低聲向我說，好像說這話是大逆不道的。苗和應都是知識份子；係是一個兵士，他剛在兩年前在漢口被擢為張學良部下一個少不更事的軍官。但他們三人都很熱情，沒有自私自利觀念，這種品性顯然給他們的年輕司令相當的影響；我知道他們有影響他的力量。他們所看不慣的是在

事變後幾個星期內所扮演的難堪插戲，無盡止的談判的插戲。這也許是很可憐惜的一回事。我們意氣揚揚地乘車馳回西安。不管以後發生什麼困難，他們都準備加以克服。我想起鮑羅廷在武漢政府解體後掃興回國時所發的怨言：「他們年青的時候都是好人！」中國軍閥官僚制度給與許多熱心的青年軍官的壞影響，鮑氏在留華期內是看得够多了。中國的革命是中國的青年造成的，而中國的青年又總是被犧牲者。然而就是一個國家的青年也能够學習歷史的教訓的；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造成了無數現實主義者，也造成了無數革命者。

甚至在委員長被釋放後，西安還有很多的消息，我很想把牠們傳播一些到外邊去。但當時的新聞檢查（西北當局和南京政府的雙重檢查）使人捉摸不定。而不久以後，這問題很簡單地被解決了。檢查網像幕布一樣地懸掛在我們的四週。

我知道在這期間官方的告白比個人的印象更有份量。我一到西安，就企圖跟陝西將軍楊虎城晤談一次。自從張學良離陝之後，楊虎城實際上是西北最高領袖。史沫特莉認識楊氏一個秘書，這位秘書是外表上並不活潑的青年，曾經留學德國，他那就沉靜的外表包藏着無限豐富的精神。通過他的關係，我們跟楊虎城定了一個約會。

楊虎城的司令部設在新城，這是西安城內一個很大的堡寨。「新城」這個名字很不適切，因為這地方依然是唐代故宮的舊址，曾經做過皇帝們的紫禁城。日晒雨淋的高聳的城牆沒有什麼新的氣象，不過添了一些新式機關槍的基台而已。但唐代原來的建築物一座也沒有留下；我們在一間很舒適的房子裏等候着這位「叛軍」司令。房內的擺設是中國式的，但有很

適意的椅子。

楊虎城有一種混合的聲名。他的祖先是誰都知道的。他像許多其他中國將軍一樣，開始成爲當地的首領。他那豐富的精力和兇猛的性格使他的部下軍隊日益擴大。過去中國動盪不定的政局往往使少壯軍人乘機躍起。一九三六年華北各將領聯合抵抗國民革命軍的北進時，楊虎城掌握着西安城。他宣布自己擁護國民革命，被劉鎮華部隊圍攻了八個月，終於由馮玉祥給解了圍。

他死守西安的功績，使他獲得『虎城』（虎之城）這個榮譽的名字。但陝西任何地方，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個渾名：叫做『楊娃娃』。（我們發覺了陝西許多農民都只知道楊娃娃，不知道他別的名字。）南京政府給他陝西綏靖主任的銜頭，他從訪問日本回來之後，就開始統治陝西。西北窮困，土匪猖獗，楊氏最初治績之一就是削弱土匪的隊伍。楊氏處理這個問題的手續是很簡單的：他認識本省大的匪首，他邀請五個匪首到他衙門來喝酒，而在就席以前把他們槍斃在院子裏。

在『雙十二』運動中跟張學良合夥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如果照楊虎城的意思做，則蔣介石將軍能否回到南京，實一疑問。張楊二人竟能聯合，使許多人感到驚訝。大家都知道這隻『陝西老虎』本來不歡迎東北軍來到西北；但當楊氏認識了這位『剿匪司令』，『沒有侵犯陝省治權的意思時，他表示自己同情張學良的反抗和反日的政策。聽說這位陝西將軍的抗日意志非常堅決，對於南京政府的『退讓政策』深表不滿。他現在是陝省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抗日聯軍代理總司令。我們急想會一會這西北的暴躁漢。

那位講德語的秘書回到房裏來了，跟他們來的是一個體格壯大的人，穿着樸素的藍軍服，沒有任何勳章。『楊老呢？』並不拘泥禮節；他揮手請我們坐下，於是帶着一種呆板的表情，等待我們發問。當我們通過那個秘書用德語向他提出問題的時候，他用一種非常柔和的聲音回答我們，這跟他的大力士體格和以粗莽著稱的聲名成了顯明的對照。我感覺到他說話所以如此柔和，只因為他不如比就要大聲吶喊似的。我們最初問他扣留委員長的意義和目的，楊回答時所用的語句都是當地報紙上時常出現的語句。『我們要求蔣介石將軍尊重而且接受民衆的意見，停止內戰，實行抗日。我們不得不用兵諫手段阻止新的內戰，藉以聯合全國力量抵抗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的運動是跟全世界和平陣線分不開的。』

『你們這個運動跟最近由李白領導的西南「反日運動」有什麼區別呢？』我問。

『我們不能代替西南當局說話。對於任何真正的反日運動。我現當然要給以最大的同情。但西南的綱領並不明確——牠沒有說明怎樣達到運動的目標。我們的綱領是完全的：張學良將軍的宣言所述「八個基本原則」就是這綱領的梗概。我們綱領的一部份已經實行了。』

我們於是提出外報對於西安事變的原因的完全矛盾的推測。有的說這完全是日本的陰謀，而汪精衛就是日本的首要代理人。楊氏對這問題的回答，據我的猜想，是不能公開的，其中最無害的一句是：『我們對於汪精衛這樣的人物，決不會有一點敬意的』對於東京方面的消息，說西安事變是莫斯科和第三國際的工作，楊氏給以更認真的回答：『不對，這是不真實的說蘇聯或第三國際是我們運動的幕後策動人，這降低了我們自己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價值。不過我們覺得蘇聯跟其他民主國家應該同情我們為求民族解放的民主運動。』

『你們這個運動怎麼是民主運動？』

『首先因為牠表現了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路下受苦的滿洲華北人民大眾的意志，但我們的要求中也有許多是基本的民主要求——保障民權。在西安，我們已經釋放了政治犯，宣布了集會結社的自由。我們相信中國需要充分的政治自由，這樣才能團結所有力量保衛我們的祖國。』

我感覺到我們開始逃出了通常會談的客套，因為『民主』在當時的中國還是一種諱忌的名詞。我們就抓住這一點：『你運用「統一戰線」的口號，就是這個意思嗎？』

『抵抗日本的侵略已成爲全民族一致的要求，』這位陝西將軍用勁地說。『我們認爲在這樣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一切黨派的利益都必須退入幕後，一切力量必須在抗日旗幟下團結起來。民族反日統一戰線不僅是一句口號。牠在目前的中国是到了實踐的階段。』

『但中國真打得過日本嗎？』

這是一個基本問題：這恐怕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過去幾年中某些要人的論調就是說中國太弱，無力抗戰；一定要等到建立起更強大的空軍，建立起武器更精良的國軍，才能抗戰。中央政府在一切危急存亡的時候都是憑這個論據來確定牠的外交政策的；牠已成爲老生常談，十個人中有九個人都相信此種論調。

中國蘇維埃主席毛澤東氏，本年夏天跟一個冒險訪問紅區的美國新聞記者會而時，說到這同樣的問題，也承認中國這弱點。毛氏力主中國只有在廣大的戰場上展開持久的游擊戰，才能取勝，他說中國一向都宜於此種戰爭。的確，中國紅軍在抵抗絕對佔優勢的軍隊時的

戰鬥紀錄，似乎證明了運用此種戰爭的可能性：如果滿洲義勇軍能够牽制住日本衝成軍，則全中國武裝抗戰一定會獲得驚人的成績。

楊虎城是有名的戰士，我不知道他對這問題有何意見，結果他的回答更足驚人，因為他所運用的是心理學上的論據，而不是戰略上的論據。

『怎能抽象地答復這個問題呢？中國的力量不是在於飛機坦克——這些武器——日本只有比中國多。我們瞭解自己非抗日不可，這種瞭解就是我們的真正力量。問題不在於物質的力量，而在於不得不戰的意志。只要有鬥爭的意志，我們就能作戰。』

『這是真正的回答！』中沫特利熱情地說，當翻譯者把楊氏的回答譯給他聽的時候。同時我也同意如下的事實：南京政府過去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中國的抗戰意志。我們覺得自己對於楊虎城有一種新的敬意；看他的樣子，似乎說得出就做得。

我們於是問他關於釋放委員長的事情，而他的回答是我們意料得到的：『蔣將軍一向不瞭解中國民衆的反日情緒和抗日要求，因為他老跟親日份子接近。我們利用他在西安的機會，有系統地跟他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終於使他接受我們改變國策的主要原則。我們當然釋放他。』這種說明雖然不無意義，但顯然太簡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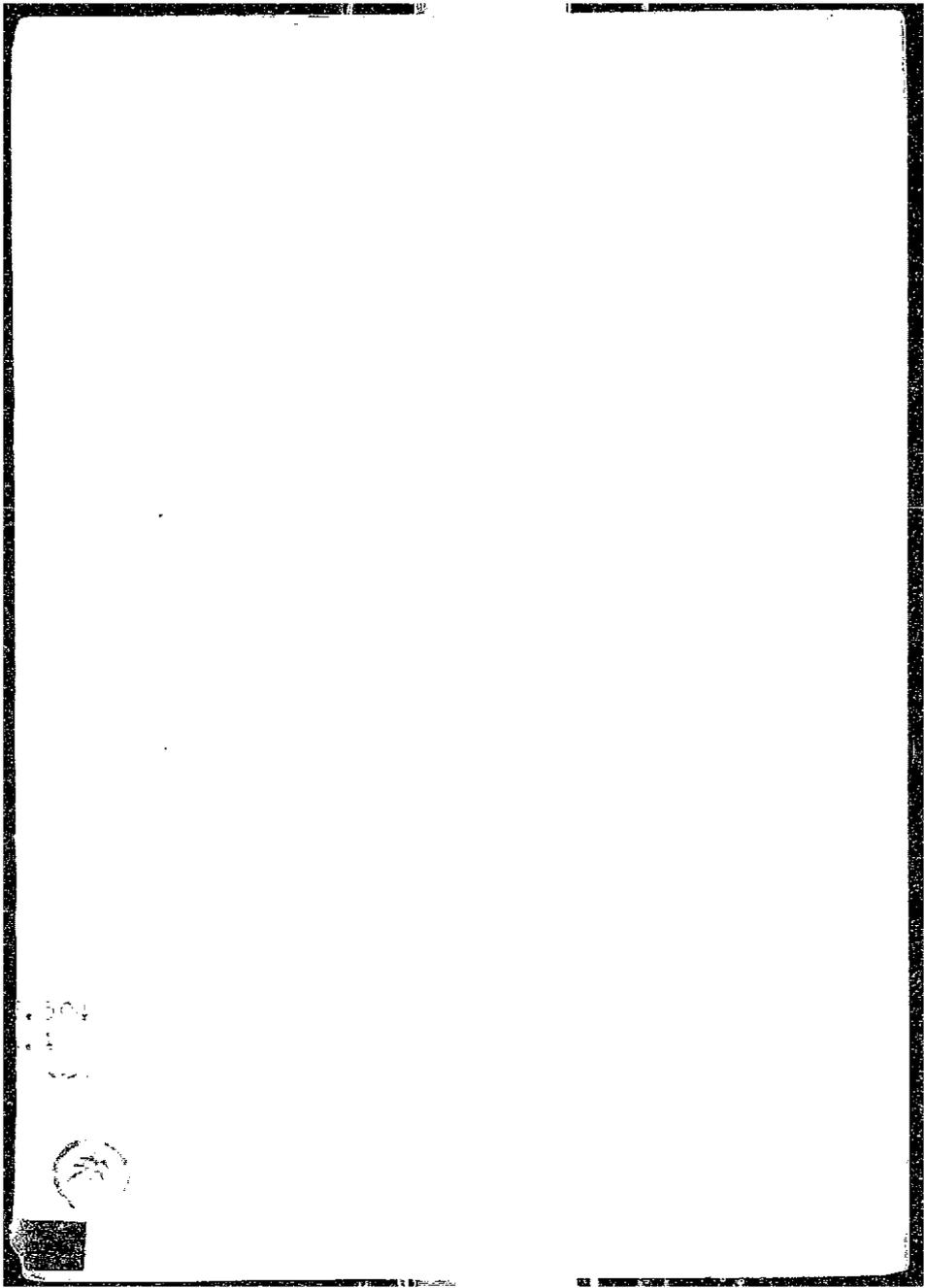
我們問他西北軍隊是否反對釋放委員長。楊氏否認這個，但我覺得他的看法是膚淺的。他彷彿以為當時的局勢甚為滿意。『我們相信委員長的真誠。當他改組了南京政府，清除的親日份子的時候，他將成爲我們真正抗日領袖。』這彷彿是最後的話了，我們起身告辭。『但請記住，』楊突然熱情地說，『此次西安事變不是偶然的事，不是兩個將軍的單獨行動。』

這是西北全體軍民一致的要求。」

『我們由運動起對沒有私人的仇恨。我們只希望停止內戰，實行抗日戰爭。我們沒有反對蔣介石將軍。我們最大的希望就是跟他一同抗敵。我們的要求是簡單的：「對內和平，對外誓死抵抗侵略者！」』

『喂，你覺得楊虎城怎樣？』我們來時，我問史沫特莉。她纏起眉頭，這與其說是不高興，不如說是聚精會神地在思索。『我不喜歡他的聲音。但他也許不錯——他原是貧農出身的。』她老是袒護無階級的背境的。『不過我總覺得他不十分靠得住。』

這次談話本身是不錯的，如果有人相信的話。我發出一通電報：這是我最後向外界的報道。不久以後，封鎖認真地開始了。



100
100
100

